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91期（民國105年3月），99-15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
——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

鍾延麟**

摘　要

1945年9月，中共為搶佔中國大陸的東北地區，成立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統籌負責、指揮部署。然而，在東北工作的領導問題上，例如：1945年底是否要調整「獨霸東北」方針、1946年春有否積極創建革命根據地，以及如何因應國民政府的軍事攻勢。彭真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人出現嚴重的分歧和爭論，進而演變成雙方勢不兩立的局面，最後迫使中共中央在1946年6月介入改組東北局。東北問題引發的衝突和不和，對於彭真之後與高崗、林彪、陳雲的政治互動，造成負面影響和長期陰影；彭真的政治仕途也為此屢受干擾和牽制。「改革開放」時期，在如何撰寫東北相關歷史的問題上，彭真和陳雲重啓爭論。彭真晚年為留歷史名聲，致力呈現和推銷自身的歷史看法和觀點，努力影響中共官方對此部份歷史的書寫和論述。本文有助增進認識中共高層人事關係因過往嫌隙而長年暗中較勁、潛藏競爭的特性。

關鍵詞：彭真、東北局、陳雲、林彪、高崗

---

* 作者特別感謝陳永發教授、李海文研究員，以及其他不便具名的中國大陸研究人員，曾對本文惠予指導與支持。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作者並感謝兩位審查人所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004-085。
收稿日期：2015年8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5年12月7日。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　言

中共東北局爭論指的是：從 1945 年底至 1946 年中，中共在東北的高級幹部之間，在當地應擇取何種經營方向、如何發展勢力和對付日漸逼進的國民政府力量等問題上，出現嚴重的政見歧異和人際衝突。彭眞（1902-1997）當時身任東北局的最高領導人，乃是相關爭論的中心人物。在此一過程中，彭眞與林彪、高崗、陳雲等人關係緊張、對立，其領導地位最後甚至被後者聯手推翻。中共東北高幹內部的激烈爭論，雖然爲時不及一年，但讓主要當事人之間結怨極深，甚至在日後不斷地發酵，既影響彼此間的政治關係，也長期對中共高層內部增添了不和的因素與不安的種子。

關於彭眞對中共東北局爭論的涉入情形，探討最爲詳盡的中文著作，莫過於彭眞的官方傳記編寫組成員所撰的《彭眞主持東北局》。其對彭眞主持、參與東北局領導期間的政治活動有仔細的描寫；也細密地追蹤彭眞在東北的重要決策和作爲，是如何地受到中共中央意向的影響。[1]《彭眞主持東北局》的觀點和陳述，也成爲《彭眞傳》、《彭眞傳略》中論及這段歷史的主要內容和基礎。[2]《彭眞主持東北局》親近彭眞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彭眞主持東北局》將彭眞刻劃成一名忠心耿耿按照中央旨意辦事的執行者，較少碰觸彭眞在東北自主裁決、理應自負責任的一面，以及其有無因時、因地制宜的問題。在處理與彭眞發生爭論的對象如林彪、高崗這種被中共官方視作反面歷史人物時，簡單地以「壞人」爲了爭權奪利而「狼狽爲奸」作解釋，以襯托彭眞在東北是爲奸所害的孤臣形象。至於屬於中共正面歷史人物、在東北與彭眞立場不同者如陳雲，則盡可能地淡化處置。

關於 1940 年代中期中共經營東北的問題，中國大陸的金冲及、楊奎松、田玄、孟醒、舒雲等人的相關著作，乃有別於中共官方慣用的「正邪二元對立」

1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 《彭眞傳》編寫組，《彭眞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卷 1，頁 318-479；《彭眞傳》編寫組編、田酉如著，《彭眞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145-167。

史觀和論述，對本文探討彭眞在東北的政策和人事議題，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引用價値。無可諱言地，其不免也存在研究的侷限，讓本文有開拓的空間和創新的機會。金冲及、楊奎松的論文有助了解中共在東北重大決策的由來、思慮和轉折，但其文畢竟並非探討中共東北大員之間的政見異同和內部互動。金氏雖隱然透露中共黨內當時確有意見不一，卻僅點到爲止，在涉及敏感或爭議之處，還以「東北局」、「東北局負責人」代稱彭眞，迴避對之點名；田玄的書也對東北高幹間的爭論輕描淡寫。孟醒、舒雲的文章有益認識彭眞、林彪在東北的分歧所在，但其討論時段限於東北時期，全然未敘及後來的情況。[3]需要著重強調的是，無論是中共官方的彭眞傳記或是前述個別學者著作，都沒有追論東北爭論如何具體影響彭眞日後的黨內關係和政治發展；也無展開介紹彭眞晚年就東北歷史問題爲己澄清、與人爭辯的情況。

西方專論或涉及彭眞的研究著作，雖多知道彭眞有一個東北爭論問題，但囿於資料缺乏和視角狹窄（討論縮限在彭眞和最高領袖的關係和他主管政法的角色），沒有深入探查此事的底蘊，也鮮少注意其後續的影響和發展。[4]

本文欲處理的問題有：1940 年代中期彭眞領導東北局期間，出現爭論的問題和發展過程爲何？彭眞去職後，他的東北問題受到什麼樣的政治對待和處理？相關事件在之後如何影響彭眞與高崗、陳雲、林彪的政治往來，以及其個

3 金冲及，〈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28。楊奎松，〈一九四六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132-152。田玄著，周宏雁、姜鐵軍主編，《解放戰爭全記錄．卷一：和戰之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孟醒，〈彭眞、林彪在東北局〉，《文史精華》，總期 273（2013 年 2 月），頁 9-14。舒雲，〈林彪與東北解放戰爭（上）〉，《黨史博覽》，2009 年第 4 期，頁 19-24。

4 例如：Pitman B. Potter,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3-56;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45, 360;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43, 647;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p. 39; Harold M. Tanner, *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 Siping, 194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4-118.

人的宦途境遇？「文革」後彭眞如何盡心竭力改善其東北問題的歷史評價？本文的主要論點爲：彭眞領導東北局期間，在對情勢走向看法、工作重點擺置、中央意旨判讀、對敵策略設計等問題，與其他黨人有異，多次爭執、劍拔弩張，最後以其遭到中央降職收場。毛澤東雖對彭眞東北問題的政治定性有所緩頰，但是與彭眞在東北交惡的高崗、林彪和陳雲，卻多次以此爲由阻攔彭眞的政治晉升，林彪在「文革」中更以之爲罪名聲討彭眞。「改革開放」時期，彭眞不滿陳雲主導東北問題的歷史解釋權，覺得其觀點不符史實、對己不公，便撰文爲己辯護，要求中央表態，並積極介入相關官方歷史的撰寫。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檢視彭眞個人歷史中一個頗具爭議性的部份，並且對認識中共早期的高層菁英關係、黨內歷史詮釋紛爭問題，以至政治史有所裨益。本文使用的資料，主要包括：年譜傳記、回憶資料、官方檔案、「文革」批判資料、訪談資料，[5]以及相關的研究著作。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有八個部份：首先是扼要介紹彭眞主持東北局期間與同僚發生爭論的問題和過程；然後是彭眞的爭論對手和毛澤東各自是如何評價彭眞的東北問題性質。接下來逐一探討在東北爭論和過節的陰影下，彭眞分別與高崗、陳雲、林彪的政治互動關係，以及毛澤東、劉少奇的有關角色和影響。之後討論在「改革開放」時期彭眞和陳雲如何就東北問題的歷史進行爭論。在結論的部份，簡單探討本文如何增進對彭眞個人若干政治特性的認識。

二、中共東北局的爭論內容和過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之時，中共中央即表露出對佔有東北地區的濃厚興趣和強烈企圖。毛澤東甚至宣稱：縱使中共現有的一切革命根據地都丟失了，只要擁有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6]其考量在於：東北比

5　本文利用作者在中國大陸所做的訪談所得，以作爲重要的補充。爲了不造成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乃以甲、乙、丙、丁代號名之，另外加上訪談的地點和時間。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鄰蘇聯，戰略位置重要，可攻可守、可進可退；該地的工業在全國位屬第一，礦產資源豐富、交通設施便利，未來的發展潛力無窮。再加上，1945 年 8 月初，蘇聯對日本宣戰後，其百萬紅軍開入東北、對之實行佔領。中共期待東北在蘇聯的掌控之下，其黨人可從中自在發展、蓄積力量，以爲將來順手接管作準備。

「二戰」結束以後，爲了同國民政府搶佔東北，中共中央在短時間之內投入大量的領導力量和人力資本，先後向山海關外派出 10 名中央委員、10 名候補中央委員（其中彭眞、陳雲、高崗、張聞天身兼政治局委員，彭眞、陳雲更是中共最高決策機關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超過 2 萬名的幹部，以及爲數達 11 萬人的軍隊（其中主要來自羅榮桓率領的山東部隊和新四軍的黃克誠所部）。[7]1945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組建中共東北中央局（簡稱爲東北局），以指導、統籌中共在東北的政治和軍事行動。東北局委員有彭眞、陳雲、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由彭眞掛帥擔任書記。

中共中央對於在東北發展、開創新局如此地重視，爲何會任命彭眞爲負責領導這一關鍵任務的東北局書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一、彭眞是中共延安時期地位揚升最快的黨內領導人之一。相較於他者，彭眞與中共最重要的兩位領導人毛澤東（中央主席）、劉少奇（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關係，皆甚爲緊密，同時深得兩人的信任。二、相比其他黨內領袖，彭眞較擅長於城市工作和管理，在黨內也分管此項工作並擔任相關的領導職務（城市工作委員會主任、城市工作部部長）。[8]東北大小城市林立、工人聚集，本來即是中共發展城市工作的重要預定目的地，彭眞應可在當地發揮所長。[9]然而，針對彭眞本人軍事經歷闕如的情況，以及爲了因應東北戰事難免的情勢，中共

冊 2，頁 769。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下冊，頁 688。

8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卷 1，頁 254-255、259-260、280-281、293。

9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9。

中央指派軍事將領林彪前往東北，明令其「協助」彭眞「指揮作戰」。[10]林彪擔任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 年 1 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的總司令，彭眞則膺任該軍的第一政治委員。

在延安獲得中央層峰榮寵的彭眞，是否有能力在千里之外掌握要領、獨當一面，打開並統御東北的局面？作爲政治新星的他，在東北身處在不少較其還更爲資深老成、閱歷豐富的高幹群體中，能否順其心意地駕馭和服眾？這都是新官上任的彭眞所將面臨的嚴峻挑戰。

（一）1945 年底工作方針轉變的爭論：從「獨霸東北」到發展根據地

彭眞率領的東北局東出山海關後，要如何經略關外的「白山黑水」？1945 年 9 月底，中共中央（因毛澤東前赴重慶與國府進行談判，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一度主張東北局採取向鄰近蘇聯、蒙古、朝鮮的四周邊陲地區分散發展的方針，將來再圖控制南部（南滿）的鐵路幹道和沿線大城。[11]但彭眞認爲初來乍到對環境不熟悉，加上當下人手不足、許多人員還在趕來東北的途中，所以實際上沒有執行此一分散發展的方針，而是將黨員幹部和部隊主力置於南滿。

10 月中旬，毛澤東返抵延安後，認爲國軍尚未進入東北，國府主要關注關內，能用於東北的兵力也有限，以及蘇聯紅軍對中共東北局態度友善並加以鼓勵。[12]他決定「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親自主持制定了「竭盡全力，霸佔全東北」的工作方針，也就是主張集中主力在從錦州至瀋陽的一線地帶，阻絕國府軍隊出關入境。[13]

彭眞對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新定的工作方針悉心領會、堅決執行。10 月下旬，彭眞指示東北人民自治軍將領：當前作戰方針和任務是配合蘇軍佔領東

10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1，頁 351。

11 〈軍委關於爭奪東北的戰略方針與具體部署的指示〉（1945 年 9 月 28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冊 15，頁 300。

12 金冲及，〈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2-13。

13 〈中央關於集中主力拒止蔣軍登陸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5，頁 364。

北、保住瀋陽，拒敵於山海關內。[14]時至 11 月中旬，彭眞猶饒有信心地認爲：前「滿州國」的軍隊可以成建制地順利收編（他以摘拿成串葡萄爲比喻），憑藉相關力量可以實踐完成「拒敵於國門之外，獨佔東北」的政策。另外，彭眞也認爲在東北中共比國民黨更有政治影響並享有群眾的好感。[15]

相異於態度樂觀、積極推行黨中央「獨霸東北」方針的彭眞，東北的其他中共要人之間卻逐漸形成了退避鄉村、長期打算的看法，並促使中共中央調整原有的工作方針。一是來自前線的軍方將領。黃克誠領軍趕赴東北後，發現實際情況遠不如原先預期的光明，甚爲擔憂重蹈當年中共西路軍孤立無援、兵敗河西走廊的覆轍。[16]11 月下旬，他向毛澤東反映中共部隊遭遇的「七無」困境（無黨組織、無群眾支持、無政權、無糧食、無經費、無醫藥、無衣服鞋襪），並提議暫不作戰、進行修整，「以一部主力去佔領中小城市，建立鄉村根據地，作長期鬥爭之準備」。毛澤東要黃克誠直接向彭眞領銜的東北局請示和提出建議。然而，黃回憶「先後給東北局發了三封內容類似的電報，提出建立根據地的建議，但始終未見回音」。[17]相對於彭眞的不予回應，黃克誠所提的不宜「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應及早建立後方根據地、站穩腳跟後再尋求與國軍決戰的意見，爲林彪所採納。[18]面對在 11 月間已開始出關進擊東北的國軍，林彪沒有按中央、東北局（彭眞）「守住大門」、節節抵抗的指示行事。他主張避免倉促應戰，以防被各個擊破；引對方拉長、分散後再伺機突擊弱點。[19]

另一是來自北滿地區的政治領袖。11 月 20 日，高崗、張聞天、李富春抵達瀋陽後，即參與彭眞主持的東北局會議。高崗、張聞天在會上表示：蘇聯勢必會將主要城市交予國民政府，國軍也會湧入東北；在敵強我弱之下，中共在

---

14 呂正操，《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頁 383-384。
15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 167-168。
16 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頁 209。
17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227-229。
18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 229-230。
19 舒雲，〈林彪與東北解放戰爭（上）〉，《黨史博覽》，2009 年第 4 期，頁 21。

東北應避走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作長期應戰的準備。彭眞則繼續堅信中共的優勢地位、蘇方的支持和奪佔南滿城市的重要性。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20]高崗、張聞天轉赴北滿後，與 11 月初成立的北滿分局書記陳雲交換意見，感到所見略同、一拍即合。不久，三人聯名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滿洲及北滿工作的意見與請示〉，反映他們不同於彭眞將工作重心置諸南滿的意見。他們主張：獨霸東北已不可能，宜將發展重心轉至北滿、東滿、西滿的中小城市、鄉村地區，盡快在其中建立根據地。[21]

中共中央看到情勢急遽變化，特別是 11 月下旬蘇聯聲稱要履行對國民政府的條約義務，讓國軍接管東北主要城市和鐵路幹道，以及東北軍方和北滿黨人紛紛提出轉赴邊陲地帶發展的意見後，也認爲原先「獨佔東北」、控制各大城市的計畫已無可能。11 月下旬起，中共中央（毛澤東因病休息，由劉少奇代理主持）表示爲了「照顧」蘇聯在東北對國民政府的條約「信用」，開始要求彭眞及東北局將工作發展重點，轉朝創建農村根據地的方向調整（劉少奇在發給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電文中，對此用「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形容；相關文字有無發給彭眞和東北局？這是否成爲黨中央此時和其後對東北局指示的核心方針和唯一內容？後來皆成爲爭論的議題）。12 月 28 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給東北局〈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其中指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地區，是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22]毛的指示形同正式放棄了原先的「獨霸東北」方針，確認東北問題複雜、艱鉅，中共在無法一舉吞佔東北的情況下，必須從長計議、步步爲營。

1945 年 11 月至 12 月，東北局不少人提出要離開大城市和主要幹道而去發展革命根據地時，彭眞反應消極、轉變遲緩，曾一度心想堅守瀋陽，而遭致

[20]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 132。
[21]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 171。
[22] 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收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卷 4，頁 1179-1180。

林彪的反彈和不予配合；[23]另也遭到高崗、陳雲的質疑和催促。[24]劉少奇亦以個人名義致電彭眞：「我對你們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似乎仍有奪取三大城市姿勢」。[25]彭眞意興不高、轉變緩慢的可能原因有：

一、對於東北的城鄉關係和區域發展格局，彭眞認爲有其特殊性，包括：大中城市林立、鐵路交通便捷；城市經濟和工業發達，其運作可自外於凋敝的農村；重要城市多座落、集中在南滿，而且當地人力、資源富饒，可供給軍需。[26]依此思路，佔有大城市和統領南滿，不但必要，更應優先。此外，彭眞的城市管理專長，在此處也更得以適才、適所。

二、彭眞對於情勢過於樂觀，對獲得蘇聯紅軍支持有過高的期待，特別是以爲後者會將其佔領的城市要地和虜獲的日本軍隊武器裝備，做出有利於中共的安排。然而，實際的發展卻非彭眞所期盼的順遂，甚至在 11 月下旬發生蘇軍威脅中共限時撤離瀋陽等中心城市的情況。蘇聯佔領東北期間，有時重視自身的國家利益，甚於發揚國際主義、支援中共，這讓寄望蘇方奧援的彭眞頗爲被動。

三、彭眞不懂軍事作戰（他自己也承認），比較看重主要城池的得失及其政治象徵意義，至於軍隊有生力量保存的關鍵意義，則較無體認；更重要的是，彭眞似不曉得發展革命根據地對於維持、支援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至關重要，尤其是分化並動員群眾，促之參軍和提供後勤支援，以及藉此加大部隊移動的縱深空間和安全屏蔽。對於急需解決的兵源問題，彭眞以爲透過收編地方武力，軍隊即可以迅速組建和擴張，對相關工作的難度和複雜性有所低估，彭眞後來也爲此遭受嚴厲批評。[27]

---

23 孟醒，〈彭眞、林彪在東北局〉，《文史精華》，總期 273，頁 10；舒雲，〈林彪與東北解放戰爭（上）〉，《黨史博覽》，2009 年第 4 期，頁 21。

24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 149-150。

25 〈劉少奇關於應以主要力量建立東、西、北滿根據地致彭眞電〉（1945 年 12 月 24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5，頁 512。

26 彭眞，〈東北解放戰爭的頭九個月（1988 年 11 月）〉，收入氏著（下略），《彭眞文選（1941-199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 632。

27 鍾子雲，〈回憶東北「八一五」光復初期的幾個重要情況〉，收入李海文主編（下略），《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1921-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頁 335。

（二）1946 年上半年對執行新方針的爭論、四平決戰

1945 年底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要努力發展革命根據地以後，關於此一新工作方針的執行問題，便成爲東北中共高幹爭論的焦點。彭眞自認他在接獲毛澤東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後，就對發展根據地甚是注意、未嘗放鬆（其晚年對此特別強調）。[28]但是當初積極呼籲在偏遠地區開創根據地的其他東北高幹們，卻認爲彭眞對這一新工作方針的宣傳加以設限，[29]而且在現實中仍然將工作重心的主要比例，置於準備攻佔大城市的目標之上，活動範圍也徘迴在距離主要城市和交通幹道附近不遠的地域。換言之，他們認定彭眞是「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有如將毛澤東的新戰略指示當作具文。[30]在東北與彭眞工作關係密切、政策立場相近的伍修權，晚年也指出東北高幹之間存在的立場分野：

> 開始撤離瀋陽時，我們的指導思想還離不開大城市，仍在瀋陽附近轉，先撤到本溪，在那裡呆了一個多月。隨著形勢發展，又轉到撫順，在那裡召開了撫順會議。在此以前，我們對東北地區的局勢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主張打大城市，另一種是離開鐵路幹線，建立農村根據地。[31]

伍修權所言的撫順會議，指的是 1946 年 3 月上旬在撫順舉行的東北局會議。在此會上，中共東北要人針對工作經營方向問題的爭論白熱化，甚至到了當面指責對方的田地。[32]林彪在會中公然批評彭眞主持的東北局「沒有一比較突出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他提出：「今天在東北以戰爭和發動群眾是主要的，但有些同志不是這樣認爲的」，「城市和鄉村的問題，看法很不一致」，

---

28 彭眞，〈東北解放戰爭的頭九個月（1988 年 11 月）〉，收入《彭眞文選（1941-1990 年）》，頁 645-646。

29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 333。

30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 186。

31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 204。

32 金冲及的〈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沒有提及東北局此一重要會議；田玄在《解放戰爭全記錄．卷一：和戰之間》中，雖指出此會發生爭論，但卻刻意迴避了彭眞、林彪二人在會上的嚴重對立和直接交鋒。

「東北局沒有戰爭觀念」、「發動群眾不敢放手，有右的傾向」。[33]林彪、黃克誠還批評彭眞、東北局沒有用心建立根據地、沒有替軍隊提供良好的後勤保障。[34]

根據其他與會人士的觀察：林彪在會上的發言「有傷忠厚」；彭眞不與之爭吵，表現得較有「涵養」。[35]彭眞在會上並非孤家寡人，而是獲得林楓、李立三、呂正操等人的支持。林楓質問林彪：「這是東北局的會議，怎就你一個人講？」針對林彪批評彭眞、東北局分派太少幹部到農村開展根據地工作的意見，林楓回以「來的少，就來一萬多人」。[36]林楓更反過來批評林彪「一仗都不打，從山海關一直退到這裡，是逃跑主義」。也就是指責林彪在去年 11、12 月之交沒有盡責「守住大門」和攔截國軍。林彪辯解：依當前情勢，不應硬拼；而且其行動皆報告請示中央。[37]李立三不但呼應彭眞主張的有蘇軍支持、中共享有優勢的意見，更提出改組東北民主聯軍統帥部，也就是改變林彪統帥該軍的領導地位。[38]眼見會中彭眞的聲援者不少，彭眞作結論時也略作自我批評，[39]林彪在會議尾聲相形收斂許多。[40]

東北局撫順會議雖然看似平靜落幕，但因政策爭論引發的人事對立，在會後進一步加劇演變成彼此皆向中共中央告狀、主張將對方調離現職的地步。衝突的兩造在東北結怨甚深、以至長年不忘，恐與這種彼此在政治上皆不留餘地、殺到見骨的作法有關。彭眞方面，他曾提議改組東北民主聯軍的領導層，不再由林彪領軍；[41]林彪方面，撫順會議後他與沒有趕上會議的北滿代表高崗在梅河口交換意見，兩人商定由高崗前去延安報告東北情況，並敦請劉少奇前

33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160-161。
34 孟醒，〈彭眞、林彪在東北局〉，《文史精華》，總期 273，頁 12。
35 溫相，《高層恩怨與習仲勳——從西北到北京》（紐約：明鏡出版社，2008），頁 349。
36 穆欣，《林楓傳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 258。
37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 333。
38 李思愼、劉之昆，《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 283。
39 孟醒，〈彭眞、林彪在東北局〉，《文史精華》，總期 273，頁 12-13。
40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161。
41 孟醒，〈彭眞、林彪在東北局〉，《文史精華》，總期 273，頁 12。

來關外，代替彭眞主持工作。[42]高崗最後雖因局勢緊張沒有成行，但是林彪、高崗的此次會晤相談和達成共識，猶如東北軍方和北滿黨人兩股反對彭眞勢力的完成結盟。這股政治合流後來成爲推倒彭眞在東北局首席地位的主要力量。

彭眞在 1946 年第一季、甚至接連的第二季，繼續表現追求大城市的傾向，其成因可能除了前述的彭眞首重掌控城市的政策偏好、對蘇聯軍隊仍寄予厚望（時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的羅榮桓後來稱此爲「想靠紅軍保鑣」），[43]以及他偏重政治、不諳軍事的思考慣性；中共中央對東北問題的立場模稜和政策操作，也是一個具有關鍵影響的重要因素。

一、中共中央對東北政策本身的模糊性。在東北局內部爭論的過程中，彭眞每每堅稱其乃「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指示精神」。[44]事實上，由於中共中央對東北的政策和指示中所存在的「兩面性」，讓彭眞和其對立面都可以從中找到支持自身主張的政治依據。中共中央在 1945 年底陸續要求東北局努力創建革命根據地的主要指示，就有這種情形。例如：劉少奇代中央起草的指示，雖指出「力求控制」周遭中小城鎮和廣袤農村爲「工作重心」，但文中也提到「長春路沿線及東北各大城市」應要「力求插足」；[45]毛澤東在〈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中，強調「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地區，是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但也表示在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附近地區，「我黨應當作充分的工作，在軍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線，決不可輕言放棄」。[46]有鑑於此，代表彭眞對東北問題看法的著作強調：中共中央即使在提出「以控制長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爲工作重心」時，「也沒有提出過不去阻擊國民黨軍的進攻，而輕易地將大城市和主要鐵路讓給國民黨去佔領」。[47]彭

[42]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 43。
[43]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 319。
[44]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上冊，頁 156。
[45]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1，頁 344。
[46] 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收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卷 4，頁 1179。
[47]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103。

眞晚年回顧這段歷史時，更指稱：「從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東北局出關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我軍撤出四平、長春，隨著形勢變化，東北局和東總遵照中央指示，大部份時間是集中主力同國民黨軍隊打大仗，爭奪東北」。[48]

二、中共中央順應國內情勢發展對東北的政策操作。1946 年初，根據國共兩黨和平談判的進程發展，中共中央深度參與、甚而主導制定了東北局的因應對策。1 月 10 日，國共簽訂了停戰協定，中共中央一時也對國內的和平前景樂觀以待；毛澤東甚至曾考慮指派彭眞出任國府委員會中 8 名中共代表之一。[49]但由於停戰協定並無限制國府對東北調動軍隊，中共認爲國府的政治盤算是不欲自縛手腳，方便未來用兵以囊括整個東北入袋。[50]果不其然，次月國府即向東北大舉運兵，計劃在蘇軍全面撤離後（3 月初開始撤走）接管其轄區，並用精銳的武裝部隊逐步挺進、追剿共軍。中共中央對此自不會坐視不管，拱手讓出該黨在東北的現有地盤。

在 2 月至 4 月，中共中央（無論是毛澤東或劉少奇）和領導東北局的彭眞理念相仿、合拍（有時更是彼此加乘），皆主張集中兵力重挫在東北集結的國軍，藉此挫敵銳氣並製造軍事震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俟蘇軍一走，「不惜任何犧牲」，搶佔瀋陽以北的主要幹道和沿線重要城市如長春、哈爾濱、四平，同時保衛北滿，創造分庭抗禮的局面，[51]以達到以打促談、以戰逼和的政治目的，亦即迫使國府同意在東北停戰，更在國共分據東北的既成事實之下，最終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合法地位。[52]中共中央這一階段的指示——「爲了阻止蔣軍

48 彭眞，〈東北解放戰爭的頭九個月（1988 年 11 月）〉，收入《彭眞文選（1941-1990 年）》，頁 645。

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冊 2，頁 762、764。

50 〈中央關於目前東北工作的方針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1946 年 1 月 26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冊 16，頁 57。

51 〈中央關於控制長春、哈爾濱及中東路保衛北滿給東北局的指示〉（1946 年 3 月 24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6，頁 100-101。

52 《彭眞傳》編寫組編、田酉如著，《彭眞傳略》，頁 160-1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冊 2，頁 771-772。金冲及，〈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近代史研究》，頁 22-24。

北進，力爭由我軍佔領長哈齊及中東全線」，[53]就有論者概括為「佔領大路，阻敵北進」，以與「讓開大路、佔領兩廂」作對比和區別。[54]

根據前述「以戰止戰」、「以戰促和」的意圖和思維，4 月下旬，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不惜以重大犧牲開展四平保衛戰，甚而提出「化四平街為馬德里」。關於此一焦土對戰決策的形成，彭眞不但與聞也表贊同。[55]在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彭眞領銜的東北局督促林彪率領共軍貫徹。共軍在這場為時超過一個月的正規陣地防禦戰中，造成國軍 1 萬多人死傷，自身也付出八千餘人的性命。最後以林彪率軍放棄陣地後撤結束。中共中央雖發電肯定堅守四平一役，[56]但因為共軍本身傷亡慘重（軍方尤為痛心的是其中絕大多數是來自關內的部隊骨幹），以及隨撤退產生的一波潰逃效應，引發兩極化的評價。對此不滿的矛頭，指向強力督軍坐鎮的彭眞和他所代表的攻佔大城市、血拼求速決的政治傾向。

（三）東北局改組，林彪取代彭真

四平血戰後，林彪、高崗、陳雲、羅榮桓向中共中央發電，要求改組東北局，建議由林彪取代彭眞出任書記。[57]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最後也做此安排。其可能的考慮是：東北局內部存在工作分歧甚至「將帥不合」的局面，彭眞的領導威信已受到強烈質疑。更現實的考量是，國共和談難以為繼，兩方大戰的局面恐無法避免，東北歸於誰手的問題也終將取決於戰場而非談判。彭眞能文不能武的侷限，讓之愈加難以繼續身負領導東北局的重任。[58]

---

53 〈中央關於東北目前工作方針給東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 年 3 月 27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6，頁 104。

54 畢健忠，〈對四平保衛戰的沉思〉，《軍事歷史》，1996 年第 3 期，頁 23。

55 楊奎松，〈一九四六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135-1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冊 2，頁 772。

56 〈中央關於主動放棄四平準備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給林彪的指示（1946 年 5 月 19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6，頁 166。

57 楊繼繩，《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評述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103。

58 孟醒，〈彭眞、林彪在東北局〉，《文史精華》，總期 273，頁 10、13。

1946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要東北局重拾毛澤東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6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令東北局領導進行改組：林彪同時擔任東北局書記和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和政治委員，全權主持東北的黨政軍工作；彭眞、羅榮桓、高崗、陳雲擔任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林、彭、羅、高、陳組成東北局常委。毛澤東在同一電文中還特意加寫：「中央認爲，這種分工在目前情況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諸同志必能和衷共濟，在重新分工下團結一致，爲克服困難，爭取勝利而奮鬥」。[59]

林彪主持東北局工作後，彭眞排序僅在其之後，居於第二。但由於彭眞是被其東北局同僚聯手告發下黯然離開領導崗位，處境尷尬、形單影隻。林彪爲了削弱彭眞的權力，重用高崗並讓之兼任秘書長；林彪稱東北局由高崗實行「秘書長專政」，高崗因而「權勢很大，盛氣凌人」。[60]彭眞卻只落得管理哈爾濱一城。

1946 年 7 月上旬，林彪主持東北局會議，通過陳雲起草的《關於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因爲在 7 月 7 日通過，後來通稱爲「七七決議」）。其主要內容有：當前情勢是敵強我弱，改變敵我力量對比的主要辦法是發動群眾。爲此，要「堅持中央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正確方針」，「偏重大城市，輕視建立根據地」，會有兩頭落空的危險，「必須規定，無論目前或今後一個時期內，創造根據地是我們工作的第一位」。在作戰原則方面，在敵強我弱下，「不在於城市和要點一時的得失，而是力求消滅敵人」。「七七決議」報請中共中央審定並獲同意。東北局也迅速動員大量幹部下鄉工作。[61]「七七決議」的觀點和主張，與先前彭眞主持東北局時的評估和做法明顯有別，甚至是針鋒相對。其之頒布無疑宣告彭眞的「人去政息」。

---

59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1，頁 451、455。

60 鍾子雲，〈回憶東北「八一五」光復初期的幾個重要情況〉，收入《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1921-1949）》，頁 331-332。

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冲及、陳群主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上冊，頁 464-468。

三、對彭真東北問題的不同評價

1947 年孟夏，彭眞離開東北局，改任他職。1947 年 9 月 20 日，彭眞透過葉劍英轉交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自言「誤事不少」。他表示：「我個人在東北這一段工作沒有做好。應付那樣大而緊張的變化多端的局面，實在力不勝任」。「我的主要缺點，是作風上的事務主義，政治思想弱，經驗不足，軍事上完全外行。因而對於許多事情都須從頭摸起，要一點點摸索，才可能摸出點頭緒。但這是當時的情況所決不許可的」。[62]但是彭眞的對立面顯然不想對之輕饒。

（一）林彪、陳雲、高崗的主張：「路線錯誤」

如何看待和評價彭眞主持東北局期間的表現？陳雲首先將彭眞的責任和過失說成是「路線問題」。[63]林彪和高崗欣然呼應並有所發揮。1946 年 9 月，高崗在東北高幹會議上提出東北局原領導（亦即彭眞）主觀上「亦有缺點」；林彪接而針對性地表示：「階級鬥爭是根本思想，只有如此，才能懂得應該發動群眾，如何發動群眾，發動什麼群眾。我們有些同志當了十年、二十年共產黨員，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因此在許多問題上犯錯誤」。「一著錯，全盤錯，就要犯路線上的錯誤，成爲工作分歧的出發點」。1947 年 5 月 2 日，林彪在主持東北局會議時也說：「東北工作中的毛病，其總的根源，就是在階級觀點模糊，對和平估計、戰爭長短、城鄉、建軍、敵我力量問題之錯誤，都出在這一點」。[64]

林彪、陳雲、高崗對彭眞東北問題的一次聯手出擊，更可見於 1948 年 11 月 23 日東北局通過的《關於東北解放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其中針對彭眞主持東北局期間的工作表示：

62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20。
63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眞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期 51（2013 年 4 月），頁 139。
64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16。

> 當時情況，極為困難。尤其是當時東北黨內少數領導幹部所存在的錯誤思想，更增加了當時的困難。這些同志對於敵人的和平陰謀抱著很大的幻想，對敵我力量的對比，以盲目的樂觀，代替了冷靜的科學的分析，對舊政權舊軍隊敵偽殘餘分子的階級本質，缺乏階級的認識，過分強調少數一時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視了廣大的鄉村，因而使他們背離了毛主席 1945 年 12 月的指示。[65]

> 在堅決依靠東北人民，堅決消滅敵人，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各種革命政策上發生了許多原則性的錯誤。這是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少數同志喪失階級立場的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這種傾向，一開始就遭受到另一部份領導幹部的堅決反對，但仍給予東北人民解放事業以很大的損失。[66]

按照中共黨內的政治是非標準和操作手法，林彪、陳雲、高崗將彭眞的東北問題性質定爲「路線問題」、「犯路線上的錯誤」和「喪失階級立場」，即指其政治上的錯誤，已嚴重到違背中央路線、發展成具全局性危害的程度；當事者不但會在黨內留下難以抹去的政治罵名，更要被追究政治責任。事實上，1949 年 2 月中旬舉行的東北局高幹會議上，高崗指出「東北黨過去是有原則的爭論，有原則的分歧」，「東北局的主要領導在一系列的重要問題上，犯了原則錯誤」，「在東北一開始即有爭論，直到『七七』〔決議〕」。高崗更提出「犯了原則錯誤」、「失掉立場」的人「應加處分」。[67]

林彪、陳雲、高崗將彭眞的東北問題說成是「兩條路線鬥爭」、「路線問題」，這或因他們認爲彭眞在爭論過程中自以爲是、拒納建言、冥頑不靈（甚至意圖報復），嚴重拖累革命事業並損傷革命力量。然而，這種政治操作也有將問題上綱上線的傾向而爲人詬病。[68]林彪、陳雲、高崗對彭眞工作問題的一

---

65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頁 195。
66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22。
67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22。
68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204-205。

再突出和強調，對於彭眞在更大範圍的中共幹部內的領導形象，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在東北的幹部中就廣爲流傳「彭〔眞〕在東北犯了錯誤，高〔崗〕來後才扭轉了局面」、[69]「彭眞同志的屁股坐在馬歇爾身上」。幹部聞後甚而心生「彭〔眞〕怎能作政治局委員和北京市委書記」的印象。[70]

（二）毛澤東的表態：「路線性錯誤」

針對彭眞領導東北局工作的評價問題，1949 年 3 月 13 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表示：

> 東北局領導下的工作很有成績。吃了苦，走了路，東北全部到手，很慶幸。七大以後，全黨全軍，用腳走到東北，大約半年到 7 個月的時間，有偏差，我們開頭也不了解。山海關、錦州守了兩星期，消滅敵人在錦州與瀋陽間，也是這麼希望的。後來林彪說不行，無槍、無糧、無政權、無經費、無鞋，老百姓正統觀念。於是讓開大路，佔領兩廂。這是陳〔雲〕、高〔崗〕、洛〔甫〕的主張。中央接受了，指示他們執行了，集中起來，勝利了。彭真的錯誤，捨不得大城市，那是不對的。不要說路線錯誤，因為時間不長。中央指示後，沒有堅持，但工作不能了，要調動。[71]

從毛澤東的講話中可見：毛指出彭眞主政東北有「捨不得大城市」的過失，因而決定「陣前換將」；相對地，毛認爲林彪、陳雲、高崗、張聞天主張正確、成績卓著。然而，他沒有接受後者們對彭眞問題所作的定性。關於彭眞的錯誤，毛表示「不能算路線錯誤」，而是屬於性質較輕的「路線性的錯誤」，[72]並仍

69 宋碩，〈高等學校討論高饒事件傳達報告的情況〉（1954 年 4 月 10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 001-022-00088，「高校黨委關於北京市各高校學習七屆四中全會文獻的總結、情況報告」，頁 39。

70 〈各高等學校十五級以上黨員幹部討論高饒事件傳達報告的情況〉（1954 年 4 月 11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 001-022-00088，「高校黨委關於北京市各高校學習七屆四中全會文獻的總結、情況報告」，頁 41。

71 孟醒，〈彭眞、林彪在東北局〉，《文史精華》，總期 273，頁 14。

72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 359-360。

稱之爲「好同志」。[73]

毛澤東雖然對彭眞東北問題的性質加以緩頰，但對於彭眞相關問題背後的中共中央（包括毛個人）角色和責任，卻有語焉不詳之處，爲之後的有關爭論埋下重要的伏筆。對於中共經營東北初期的「獨佔」構想、「禦敵人於國門之外」方針和相關政策，毛表示黨中央因「開頭也不了解」而也曾如此期望，也就是承認彭眞當時並非自作主張。但毛說之後中央就接受了林彪、陳雲、高崗、張聞天主張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這種說法失之簡單，也有諉過他人之意，不足以反映、概括他領導的中央從 1945 年底到 1946 年上半年這段時間內，對東北問題持有立場的動態變化。

具體的問題如有：毛澤東在 1945 年 12 月指示彭眞爲首的東北局要重視發展建設根據地，有簡潔明文對之發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方針嗎？此時或其後的中央政策和指令，可以僅用這 8 字化約表述嗎？另外，1946 年春中共在東北集中力量攻防大城市的決策（後來發展成四平決戰），中央在其中的角色又爲何？此乃出面督率軍隊執行的彭眞單方面的決定嗎？對於以上問題，毛澤東都沒有說明和澄清。對於 1946 年堅守四平決策甚有意見的黃克誠，要直至 1959 年廬山會議期間，方從毛澤東口中得知毛才是此戰的決定人。[74]

彭眞因爲忙於接管北平，沒有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因而也無法爲自己的東北問題發言和解釋。

四、東北爭論陰影下的彭真和高崗關係

高崗是中共建政前後地位竄升最快的政治人物之一。1949 年他接替林彪出任東北局書記；同年獲任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 6 位副主席之一；1951 年被任命爲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2 年被任命爲與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成爲當時上調中央的 5 位地方領導人中最風光

73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23。
74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 237。

的一名，以至於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的說法。

高崗個性簡單、好惡分明。他後來檢討時坦承：「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有成見的，如對彭眞等人，理都不理，有報復心」。[75]高崗對於彭眞確實有怨必報、屢屢爲難。根據訪談的資料，早在高崗上調「京官」以前，1948 年中共中央組建中央華北局，原擬定由彭眞出任第一書記，但因高崗和陳雲、林彪等表示反對而作罷。最後由劉少奇擔任華北局第一書記，黨內資歷和地位不若彭眞的薄一波居次，彭眞僅擔任常委。1950 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去世，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彭眞和陳雲何者應接替任空缺出來的位置？同樣也是高崗、陳雲、林彪等人表態反對彭眞出任。[76]陳雲最後接繼任弼時，成爲「中央五大書記」之一。

高崗因東北爭論產生對彭眞個人的憤恨，對中共政治造成更大的影響是，其進一步發展成高崗對劉少奇的懷有成見，成爲 1953 年高崗積極「倒劉」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和緣由。東北局發生爭論時，高崗、陳雲、林彪等背著彭眞向中共中央「告御狀」、要求「換馬」，最後雖如他們所意，彭眞失去了東北局的領導職位，但是他們也自知相關作法在組織程序上不無疑義。高崗等人派人（趙德尊）專門向劉少奇彙報東北問題的始末，並希望獲其肯定和支持。想不到劉少奇回覆要「要注意團結，不要落井下石」。這讓高崗等人甚不理解，認爲劉少奇對彭眞的錯誤「有些袒護」，甚而因此對劉心生「隔閡」。[77]

在此之後，高崗在中共高層間經常議論彭眞在東北期間的不是，進而將彭眞和劉少奇掛勾起來，認爲彭眞仗著劉少奇得勢而固執、劉少奇也對彭眞偏袒而不公。例如：1951 年 1 月 29 日，韓戰如火如荼進行期間，高崗在彭德懷面前，語帶憤怒地批評彭眞當初到東北時不注意軍事工業；並憤慨地回憶彭眞在東北僅調派運煤車廂供其乘坐的往事。高崗更指控彭眞「接受了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幻想和平，有劉少奇作靠山，誰的話都不聽，林彪同志的話他

---

75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 53。
76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 年 7 月。
77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 43。

也不聽」。[78]

高崗到中央任職後，聞知毛澤東對劉少奇多有不滿。在毛澤東暗示、旁人慫恿下，高崗進一步地產生了協助毛撤換劉少奇第二號領導人地位的念頭。1953 年初，高崗耳聞劉少奇規劃起用彭眞的構想（擬要之擔任政府黨組書記）後，他本來即有的劉少奇、彭眞在東北問題上沆瀣一氣的印象更加固化，甚而形成相關人士暗中進行宗派活動和人事安插的認知。[79]

高崗在中共建政初年受到毛澤東的分外器重，甚至有「更上一層樓」的態勢；再加上，他對於與彭眞之間的東北舊帳窮追不捨，皆讓彭眞備感壓力。但由於高崗莽撞誤事，轉眼不到兩年的光景，1953 年底毛即開始對之批判、進而離棄。對於東北政敵高崗不攻自破、驟然倒臺，彭眞自然感到高興。彭眞在對下作政治傳達時表示：「高饒事件是當前最大事件」、「關係全世界革命事業」、「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問題」。針對彭眞如此強調此事的嚴重性，北京市的幹部「印象很深」。[80]彭眞也通過自己所能掌握的宣傳系統高調公布「高崗的罪惡」，強調：「高崗反對中央領導同志，無恥地造謠生事，硬說劉〔少奇〕、周〔恩來〕、彭〔眞〕一貫犯錯誤，只有他自己是『一貫正確』」；「說咱彭市長也是親美反蘇派」。[81]期以突出彭眞在東北爭論事發後一直遭受高崗無理打壓的受害者形象。

高崗政治出事後，彭眞也面臨了一次事關自己東北問題的政治考驗。中共中央爲了處理高崗問題、要之承認錯誤，以反「驕傲自滿」爲名，要求高崗、彭眞在內的高級幹部都必須作自我批評。由於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一個重要起因涉及彭眞的東北問題，特別是指控劉少奇對彭眞有所偏袒，毛澤東透過中共中

---

[78] 彭德懷傳記組，《彭德懷全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冊 3，頁 1245-1246。

[79]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 43、50。

[80] 〈各高等學校十五級以上黨員幹部討論高饒事件傳達報告的情況（1954 年 4 月 11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001-022-00088，「高校黨委關於北京市各高校學習七屆四中全會文獻的總結、情況報告」，頁 41。

[81] 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宣傳部，〈向農村黨、團員傳達四中全會提綱〉，北京市檔案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 001-012-00160，「市委宣傳部關於北京市幹部、群眾學習總路線和黨的四中全會的通知、報告及有關材料」，頁 56。

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轉告彭眞，要他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就其東北問題進行檢討。以毛爲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設想是：如果彭眞對他東北錯誤坦承不諱、虛心面對，高崗就無法繼續糾纏此一問題，進而反省自身，坦然面對自己的錯誤。

爲了讓彭眞寫好檢討報告，毛澤東允許彭眞調閱他主持東北局時和黨中央互動的原始檔案。但毛不允許彭眞調閱陳雲、高崗、林彪、張聞天、李富春與中央之間的往返電報，或不想讓彭眞看到他們當時如何對之進行批評和指責。彭眞在回顧當年的政治文件和資料後，認爲他主政東北局時，確實犯有冒險、急躁的錯誤，但其主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部署和行事。[82]

彭眞在寫檢討報告時，對中央當時的角色和作用要如何陳述和下筆？直言道出、不加避諱抑或是一肩扛下、默默承擔？彭眞感到爲難，勉強完成檢討初稿。實際領導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準備工作的劉少奇，或是看出彭眞思想上的不解和情緒上的不願，對彭眞的檢討內容並不滿意。劉少奇不但要求彭眞重寫，更指定在東北與彭眞立場不同的陳雲和李富春出面「幫助」彭眞。[83]所謂「幫助」就是勸說、逼壓就範；彭眞因而飽受壓力。

爲了配合黨中央對高崗問題的部署，彭眞最後按照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定調的「路線性錯誤」結論，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檢討他在東北時期的問題。就目前可得的資料，彭眞對中共中央當年幕後指揮的角色迴避不提，著重檢討自己的指揮無方。例如：國軍進佔錦州、瀋陽後，他沒有在敵方側後有計劃地創建根據地，而僅側重在中共控制地區內進行根據地的工作。[84]會後，北京市的幹部在向下傳達時強調：高崗犯的是「分裂黨」的錯誤、關乎「社會主義能否勝利的問題」。相異於高崗的無可挽回、無藥可救，彭眞在東北的錯誤是「可以改」的。[85]

82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4 年 8 月。

83　劉少奇，〈關於七屆四中全會準備情況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冊 6，頁 45。

84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24。

85　〈蔣南翔同志在清華大學四中全會學習幹部會上的發言（1954 年 6 月 10 日）〉，北京市檔案

彭眞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配合演出」，尤其是承擔了東北問題的主要責任，使之政治「過關」，也進一步獲得毛澤東的信任和器重。「高崗事件」後，彭眞在中共中央活動的空間和角色都明顯增大。彭眞的重要下屬王漢斌就表示：「我覺得毛主席對彭眞在東北的問題看得不是很嚴重，『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很重視他」。[86]然而，東北爭論對彭眞造成的人事陰霾，因爲陳雲、林彪依然活躍政壇而仍舊存在，並且對彭眞的政治發展繼續產生重要的制約和影響。

五、東北爭論陰影下的彭真和陳雲關係

1953 年底，陳雲向毛澤東告發高崗，是促成高崗倒臺的一個重要因素；陳雲也藉此洗刷了自身與高崗關係匪淺的觀感。但是東北爭論是否因高崗政治出事而需要重新評價？1955 年，陳雲對張聞天強調：「那時的高崗是那時的高崗，不能因爲高崗現在出了問題連那時的工作關係也不對了。東北局初期的方針爭論同高崗站在一起也是正確的」。[87]如何看待東北爭論的對立面人物—彭眞，陳雲沒有忘懷、放手。

陳雲率先將彭眞的東北問題定性爲「路線錯誤」；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七屆四中全會後，他不好再公開使用這一提法。但是陳雲仍認爲黨中央在任用彭眞時必須有所保留。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規劃在 1956 年「八大」新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以取代原本的中央書記處，擔負最高決策機構的職能。原任的書記處書記（包括陳雲）順勢轉任新建的政治局常委會成員；身爲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彭眞，是否同樣可以進入常委會？中共中央在高級幹部圈內

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 001-022-00089，「蔣南翔、范儒生、楊述同志關於四中全會決議學習的報告提綱和紀錄」，頁 41。

86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眞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2012 年第 10 期，頁 73。

8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下卷，頁 970。

就此徵詢意見時，陳雲、林彪等當年在東北與彭眞持不同意見者，咸不表贊同。[88]這一股在黨內高層質疑、反對彭眞「入常」的「民意」，毛領銜的中央無法視而不見，彭眞因而未被納入中央常委的人選。無獨有偶地，陳雲、林彪爲首的反彭「民意」，同樣在中共「八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中展現。

中共「八大」中央委員的排名順序，乃按照候選人實際得票數多寡而定；根據選舉結果，彭眞在所有新科中央委員中排在第 29 名，與其黨內資歷和當時所居權位存在不小的落差。彭眞甚至還排在他領導東北局時的部下林楓後面。相對地，在受到中央更多操控下產生的政治局委員 17 人名單裡，彭眞位居第 10 名，僅在 6 名中央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以及林彪和兩位黨國耆老林伯渠、董必武之後。彭眞在中央委員選舉中何以會遇此窘況？彭眞的東北問題和相關的人事杯葛，恐怕是重要的原因。[89]

在中共「八大」，陳雲被選爲黨副主席、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稱陳雲、周恩來、鄧小平是「少壯派」、「登臺演主角」，陳雲也實際主管經濟工作。彭眞在「八大」被選爲政治局委員和排名僅次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工作側重在黨務、政法。陳雲和彭眞原本工作交集不多，但 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卻讓兩人相對的政治地位出現一消一長的變化：陳雲被指責犯有反「反冒進」錯誤，被迫交出經濟實權；彭眞隨同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督管政府和經濟工作。彭眞爲達成大煉鋼鐵目標，經常直接召集國務院相關部門領導人討論工作、指揮調度。彭眞「代替了國務院的工作，引起一些人的非議」。[90]過去執掌經濟工作的陳雲，見此應該也不甚好受。

「大躍進」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後，1962 年春，陳雲再次被中共中央賦予經濟決策大權以助收拾經濟殘局。陳雲對情勢的評估和對策，在中共中央「一線」領導內多受支持，唯有彭眞態度保留，屢次發表異議。彭眞認爲陳雲對整

88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4 年 8 月。

89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 年 7 月。

90 Yen-Lin Chung,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 74(July 2015), p. 134.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眞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期 51，頁 146。

體情勢估計過於悲觀，不同於中共中央既有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看法；陳雲強調「恢復」經濟，彭眞反對此一提法，認爲宜用「調整」字眼；在向下傳達中央領導人關於經濟問題講話時，彭眞認爲不能僅只傳送陳雲的經濟看法；[91]陳雲主張開放自由市場，親自打電話要求北京市實行，彭眞悍然拒絕。[92]陳雲主張可採行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彭眞對此予以明確反對。這除了反映兩人有不同的政策偏好，或也多少夾雜了源於東北問題的個人意氣之爭。

1962 年夏，毛澤東高舉「階級鬥爭」旗幟，指責悲觀的情勢估計爲「黑暗風」，批判包產到戶等倡議爲「單幹風」。迥異於陳雲深度涉入「黑暗風」和「單幹風」，彭眞在經濟調整時期的立場和主張，多與毛澤東吻合、貼近。譚震林在「文革」中對此回顧：「在三年困難時期，陳雲、鄧小平都犯了錯誤，就是彭眞是促進的」。[93]彭眞自恃正確、理直氣壯，甚至可能曾意圖爲難陳雲，以報東北爭論以來一直遭其壓抑之仇。根據中共財經官員姚依林在「文革」中的揭發，1962 年夏，彭眞曾四度找之單獨談話。在前三次談話中，彭眞特別向姚依林探聽陳雲領導財經工作的情形和用人狀況，更策動姚氏挺身發言揭露財經部門的問題。此事最後因爲姚依林向周恩來報告而曝光，彭眞在第四次談話時也一改先前慫恿、煽動的態度，對姚氏表示黨內要團結。[94]

毛澤東雖然不滿陳雲在經濟調整時期的政策主張，但由於陳雲只在中央常委間交換意見、沒有對外宣揚，被批判後也立即放棄己見、不作任何抵抗，毛因此同意陳雲請假養病，對之也僅作不點名的批判。在這種情況下，就算彭眞欲要進一步追究陳雲的問題，也沒有辦法；彭眞最後只能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陳雲進行「缺席批判」，猛烈批評和質疑後者主張的經濟「恢復論」。[95]

---

91 鄧力群，〈關於西樓會議的回憶〉，《百年潮》，2012 年第 3 期，頁 12-13。

92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眞和毛澤東 1963 年後的關係〉，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2011 年 5 月 1 日檢索）

93 〈譚老闆答記者問〉，首都紅代會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公社》主辦，《新農大》，期 21（1967 年 6 月 10 日），第 2 版。

94 姚依林，〈關於我和彭眞的關係〉（1967 年 1 月 31 日）。此爲美國一名中共歷史研究者提供的資料。

95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4，頁 217。

1962 年夏以後，陳雲稱病淡出，寄情評彈。相反地，彭眞繼續參與中央核心領導。在政治上顯得「精壯」的彭眞，在「文革」初「暴斃」；以「多病」之姿躲避政治災禍的陳雲，在毛澤東離世之前長期「靠邊站」。彭眞和陳雲之間再有互動、重啓東北問題爭論，則要到「改革開放」時期。

六、東北爭論陰影下的彭真和林彪關係

1954 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彭眞按照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的要求和規定口徑，檢討其東北問題。根據彭眞的說法，林彪聞知他的檢討後感到滿意，來信表示「我們之間的誤會從此消除了」。彭眞據此以爲他與林彪因東北爭論造成的問題終得解決。[96]從後來的事態發展觀察，彭眞當時若眞作此想，可能就有些過於天眞了。

如前所述，彭眞在中共「八大」的人事安排問題上，林彪和陳雲等人一樣，強力反對彭眞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林、彭的東北積怨必在其中產生負面作用。林彪在 1955 年中共七屆五中全會被增補爲政治局委員，1958 年中共八屆五中全會獲增選爲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常委，1959 年接替彭德懷出掌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並擔任國防部長。對於林彪在黨中央冉冉直升的態勢，以及相應而來愈加重要的發言地位，彭眞看在眼中，恐怕多少也有些不安和不祥之感。[97]在後來的政治中，林彪確實化作一種不利於彭眞的政治阻力。根據訪談資料，彭眞在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內，實質扮演副總書記的角色。針對彭眞稱職的工作表現，中共中央曾考慮給予彭眞副總書記的正式頭銜，但因林彪反對而作罷。[98]彭眞的重要下屬也知曉林彪是彭眞的主要「對頭」。[99]

96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4，頁 483-484。
97 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眞》（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頁 312-313。
98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4 年 8 月。
99 李莉，〈憶李琪最後的日子和我的遭遇〉，《憶李琪》（北京：無出版者，2001），頁 299。

彭真只會被動地任由林彪欺凌而不試圖作任何政治反制？1972 年，高崗遺孀李力群呈交中共中央的一份揭發資料，提供了作不同思考的線索。如前一節所言，1962 年夏，毛澤東對於此前經濟調整時期的一些動向和作法大加批判。其中一項重要的政治發展是：以小說《劉志丹》意圖爲高崗翻案爲由，批鬥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並將高崗問題進一步擴展成「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在對此揭發和處理的過程中，彭真適時提供佐證指控的揭發材料，並且約談重要涉案人士（劉景範）。[100]彭真如此積極行事，一方面是忠心執行中央決定；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他想藉機進一步整頓、掃除與高崗曾有密切往來的政壇人士。[101]

根據李力群提供的資訊，彭真的相關政治算計，甚至曾經打量到林彪身上。李氏供稱：在習仲勳問題被揭發後，彭真偕同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以調查高崗問題爲名，找她談話，追查高崗在東北與誰最好、接觸最多，更拐彎抹角地探問高崗與林彪的關係。對於彭真的相關舉措，李力群不禁聯想：這或與彭真、林彪早年在東北的「鬥爭」有關。[102]

彭真、林彪之間因東北爭論本已緊繃的政治關係，或許又因摻入軍隊派系競爭因素而益加複雜。根據彭真親信的揭發，彭真在「文革」前曾自我感嘆欠缺領軍、帶兵的政治資歷和資本。[103]彭真和軍方重要人物賀龍、羅瑞卿的熟悉和交好（彭真在接見外賓談話時，不怕犯忌諱地將賀龍和林彪並舉讚揚），[104]雖然可或多或少彌補他在這方面的不足，但卻可能又使之陷入 1960 年代前半

100 李建彤，《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頁 10-11、18-19。

101 彭真對待馬洪的態度和作法，就是一個例子。馬洪被批判爲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彭真對馬洪之後的人事任命案多次加以反對和阻撓。馬洪女兒認爲：彭真之所以長期揪住馬洪不放，乃因彭真和高崗在東北結怨至深所致。馬雅，《大風起兮：馬洪傳——中共高層政爭內幕》（紐約：明鏡出版社，2014），頁 123-125。

102 丁凱文、司馬清揚，《找尋真實的林彪》（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73-74。

103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頁 19。

104 〈彭真市長會見剛果駐華大使迪亞卡．貝納頓談話記錄——剛果大使到任拜會並就剛果的反帝鬥爭問題交換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8-01227-04，頁 37，「北京市長彭真會見剛果共和國新任駐華大使貝納頓談話記錄」。

期中共軍中逐漸隱然成形的以林彪爲一方、賀龍與羅瑞卿爲另一方的對抗格局。[105]如此恐怕只會益形加重林彪對彭眞的惡感。

「文革」批判資料揭發：彭眞一直存有重議東北問題的想法，並且自我評估與林彪之間仍因此事而有芥蒂。[106]然而，在「文革」爆發前，可以看到彭眞識時務地曾試圖改善兩人之間的關係。毛澤東在「文革」前兩、三年屢屢公然表露對林彪的欣賞和器重。1965 年初，劉少奇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遭毛澤東怒責，其作爲接班人的威信大失，林彪的政治行情更是直升。或眼見於此，1965 年 12 月 14 日，彭眞前所未見地在中共北京市委會議上高度讚揚林彪，稱其「把主席思想高度地概括了」，「不僅是個卓越的軍事家，他同時還是一個有很高馬列主義修養的政治家」。[107]1966 年 2 月中旬，彭眞亦專程從上海驅車前往蘇州探望在該地休養的林彪。[108]彭眞對林彪的政治吹捧和噓寒問暖，除了是對林彪本人的靠攏示好，同時也是有意識地配合毛澤東欲進一步重用林彪的人事新布局。

只不過，林彪和彭眞從東北爭論深深結下的政治樑子，以及兩人在如何處置羅瑞卿問題上又生歧見。[109]毛澤東即便懷有林彪、彭眞相安共事、同時爲己

105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1），上冊，頁 368-371。

106 公安部批判劉、鄧聯絡站，《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眞在公安戰線上的反革命罪行》，（北京：無出版者，1967），頁 7-8。

107 彭眞，〈在市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收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陳樂人、謝蔭明主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5 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頁 626。

108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4，頁 470。

109 1949 年後，彭眞和羅瑞卿先在政法工作上配合得宜，之後又同在中央書記處內共事，關係友好。1965 年底，在毛澤東和林彪的同意下，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突然對羅瑞卿展開批鬥。彭眞因留守北京，沒有與會，聞知情況後大爲震驚。中共中央委託鄧小平、彭眞和葉劍英處理後續對羅瑞卿的揭發和審查工作；因鄧小平赴西南考察，此事實際上由彭眞負責。彭眞在調查羅瑞卿問題的過程中，態度較爲和緩。他人欲將羅過去的公安工作全盤否定，彭眞表示羅「還是執行了中央、主席方針的」。彭眞並指示具體職司調查的工作小組做好查證、實事求是。對於最後的調查報告指控羅的錯誤乃屬資產階級性質，彭眞提議刪去，並要人將其意見轉告林彪。打倒羅瑞卿乃是毛澤東和林彪所示意、認可。彭眞對批羅不甚積極，甚而加以限制，除了讓林彪反感外，恐也引毛不悅。《彭眞傳》編寫組，《彭眞傳》，卷 3，頁 1194-1195；《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4，頁 462、472、479；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眞：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眞理——黨史專家田酉如訪談錄〉，《黨史文匯》，2012 年第 11 期，頁 21。

效勞的規劃，在林彪不願轉圜、讓步之下，也難以付諸實行。彭眞晚年回顧自己在「文革」倒臺的原因，就認爲林彪是關鍵的因素。彭眞表示：「這個問題，我也考慮很長時間。毛主席要重用林彪，就不會容忍我在身邊」。在另一個場合，彭眞也說：「『文化大革命』很複雜，我心中有數不好講」。「發動『文革』，有個接班人的鬥爭問題，把彭羅陸楊搞下來，不一定是毛主席的本意」。[110]

1966 年 4 月，毛澤東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開始批判彭眞，林彪即投入對彭眞的批鬥。4 月 24 日，林彪與彭眞單獨談話，就主要批評後者的東北問題。此時既然毛澤東已決定拋棄彭眞，林彪也無須再遵照毛對彭眞東北問題所作的「路線性錯誤」定性，直指彭眞「犯了路線錯誤」。[111]5 月 18 日，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對彭眞的批判火力更猛，而東北問題在其中佔有最大的篇幅。毛澤東打倒彭眞的直接說詞—「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問題，反倒只是點綴。林彪指控彭眞：

> 他在延安裝著反對王明路線，到東北又搞王明路線。彭真在東北拒不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連天的時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沒有戰爭打算，幻想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他沒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味道，不搞階級鬥爭。他不把重點放在農村，不把幹部和主力派到農村去建立根據地，戀戀不捨大城市，不願離開大城市。撤出瀋陽，還賴在郊區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撫順，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農村安家，不準備打，只準備和。在東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擲，和敵人硬拼，以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掩蓋他政治上的投降主義。他藉口照顧山頭，實際上是培植他個人的實力。他不注意補充主力，只是從散兵游勇中收編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隊，後來這些部隊都叛變了，成了「座山雕」。他說反山頭，就是他在搞

[110]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眞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期 51，頁 158。

[111]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4，頁 483。

山頭，招降納叛，搞他自己的軍隊，搞小圈子，搞「桃園三結義」。[112]

坐在被審判席上的彭眞，耳聞林彪講話中脫離事實、上綱上線的部份，也無法爲己辯護。其後，林彪進而指稱彭眞是「國民黨的人」、「很壞的人」，[113]彭眞因此飽嘗苦頭。1971 年林彪陳屍蒙古大漠後，淪爲階下囚的彭眞的境遇才稍有改善。1972 年 6 月初，彭眞接受關於林彪問題的審問時表示：「在東北時，林彪信任高崗，依靠高崗。東北局改組時，我是第一副書記兼第一副政委，而高崗排在我後邊第四位，但林彪叫高崗主持東北局日常工作」。[114]可見彭眞對於自身在1946年6月新改組的東北局內權位遭到林彪架空一事牢記在心。

彭眞在「改革開放」時期東山再起後，點評已是「死老虎」的林彪更是毫不顧忌、隨心所欲。他對於毛澤東在「文革」選擇林彪作爲接班人不以爲然，認爲毛在「這點不能說英明」。[115]彭眞晚年也曾以與林彪在東北共事的經歷，自言是林彪的「老夥計」，對其瞭若指掌，而且在 1966 年就預測到毛澤東不消幾年即會「識破」林彪的「野心」。[116]

七、毛澤東、劉少奇在東北爭論中的角色和影響

綜觀以彭眞爲中心的東北爭論過程，以及彭眞在「文革」前和相關人士的關係發展，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兩名極其重要的「配角」。他倆有時「反客爲主」，對彭眞等人之間的政治互動設定框架，甚而投下令其激化的變數。以下對之簡要分析和評論。

---

112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第 3 部份林彪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

113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4，頁 500。

114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4，頁 507。

115 彭眞，〈關於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工作〉（1980 年 4 月 18 日），收入《彭眞文選（1941-1990 年）》，頁 384。

116 李莉，〈憶彭眞同志〉，《憶李琪》，頁 328-329。

（一）毛澤東方面

彭眞主政東北局時期，可略分爲兩個階段：一是 1945 年 9 月彭眞受命主持東北局至同年底；另一是 1946 年上半年，直至林彪接替彭眞出任東北局書記。在這兩個階段，關於經營東北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和彭眞多是想法相近、甚而一致，毛澤東對彭眞也指揮如意、如臂使指。

例如：毛澤東結束重慶談判後，1945 年 10 月中，主持制定了「竭盡全力，霸佔東北」的方針，彭眞積極部署和落實，期以「拒敵於國門之外」。1945 年底，毛澤東指示中共東北局要努力發展革命根據地，放棄「獨霸東北」意圖。但是 1946 年春毛澤東對東北發出的命令，仍不時具有打大仗、攻據要地，以達成與國府分佔東北的企圖。彭眞因理念相同而極力促成。共軍付出重大人命傷亡的四平之役，就是毛澤東決策定案，然後交由彭眞就近督戰。

彭眞爲達毛澤東委交的使命和任務，對於東北其他同僚的建言和異議，就算不是充耳不聞，也表現得興趣缺缺，不免讓人有寡斷、不民主的議論；在政策付諸執行的過程中，彭眞不讓講價和不顧損傷，更讓彭眞的對立面決定攜手向中央告狀，反對由他繼續領導東北局。

毛澤東當然知曉彭眞是其在東北忠誠不貳的代理人，但眼見彭眞樹敵太多、勢單力孤，同時也確實需要有人爲此前政策的結果——死傷者眾、撤軍北逃，出面負責，以平息人怨和穩定軍心；更重要的是，面對未來戰事升級，更需要的是懂得用武、用兵之人。毛因而同意改組東北局，由林彪取代彭眞的職位。毛也可以藉此人事調度，展現其順應下情、採納眾議的領袖風範。

如何評價彭眞主政東北局的工作表現？毛澤東的態度和作法，很值得玩味，也可反映其老謀、詭詐的政治性格。一、毛澤東沒有因爲東北爭論而拋棄彭眞，在彭眞遭到其東北舊敵圍攻時，還伸出援手。1946 年中，新改組的東北局通過「七七決議」，毛特地改寫部份內容，強調前段時期「我黨」「幫助

東北人民創造了廣大的東北解放區」。[117]亦即基本肯定了彭真主政期間的工作成績（事實上，這也間接肯定毛自己先前對東北的領導有方）。對於陳雲、林彪、高崗聯手將彭真的東北問題定性為「路線錯誤」，毛在 1949 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也沒有同意，仍表示彭真是「好同志」。毛制止了陳、林、高對彭真問題的上綱上線和政治追殺，也算是給彭真送暖，並讓之心甘繼續為毛所用。

二、毛澤東雖不同意將彭真的東北問題看成是「兩條路線」那麼嚴重，但仍批彭真「捨不得大城市」並將之界定為次一級的「路線性錯誤」。也就是彭真領導東北局期間，尚未至背離「革命路線」、自行一套的程度，但彭真必須要承擔有關失誤和失策的政治責任。這可部份滿足彭真的東北「對頭」欲對彭真究責的強烈意願（他們未必完全不知彭真東北言行背後的毛澤東因素，可能懾於毛的權威，只敢追究彭真責任；毛或亦希望他們追究止於彭真，不要再往上面追）。對於毛而言，因有彭真在前面扛責，他可以迴避自己涉入其中的責任問題，續保其「一貫正確」的崇高形象。

毛澤東對彭真東北問題的「保中有批」、「又保又批」，以及其貌似公允但懷有個人私心的作法，導致東北爭論化明為暗、持續不休。彭真的東北宿敵們在毛對東北問題表態後，雖已不能再將彭真的問題無限上綱，但經毛認定：彭真在東北有錯、有責，而且問題性質也不輕。他們以此為憑、見縫插針，頻頻對彭真後來的政治任命和職位安排，提出質疑或阻撓。彭真方面，他感戴毛出手相挺，從而避免被扣上「路線錯誤」的政治大帽。但彭真對於要由自己一肩扛起包括中央（毛）幕後決策在內的政治責任，總有些情緒（彭真預備提交 1954 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東北問題檢討報告，一再過不了關，就可以反映其內心不無意見）。彭真雖然不敢因此怨恨毛澤東，但昔日東北對手對此舊帳的緊咬不放，讓彭真難以釋懷，也伺機向他們討回一城。

毛澤東評斷以彭真為核心的東北爭論，乃是基於政治考量，而非事實本身。1960 年《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出版，其中收錄毛澤東 1945 年底寫的〈建

117 《彭真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真主持東北局》，頁 211-212。

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毛沒有利用此一機會適當說明當年情形，反而該文題解又將複雜的歷史問題加以簡化（如只說東北局以林彪爲首，未提東北局初期由彭眞擔任書記），甚而爲之增添更多不實的迷霧（如稱毛當時具體提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118]

從 1954 年彭眞按毛心意自承在東北是「路線性錯誤」，直到 1966 年其失勢以前，彭眞和陳雲、林彪之間因東北夙怨而關係緊張、暗潮洶湧，毛澤東未嘗不知，但也不積極化解他們之間的敵對和尷尬。毛或許打的算盤是：下屬之間重重矛盾未解，正有利其從中分化和操控。

毛澤東決定整肅彭眞後，林彪重掀彭眞的東北問題，並稱之「路線錯誤」，超出毛所界定的「路線性錯誤」，但也沒見毛勸阻，而是任之而去。

（二）劉少奇方面

1945 年 9 月至 12 月，劉少奇兩次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對彭眞的東北局工作進行指導和指揮。在此期間，劉少奇曾兩度對東北工作提出分散發展的方針。第一次是在彭眞剛抵達東北不久，但彭眞覺得中共在當地力量不足，因而沒有執行；毛澤東自重慶返抵延安後，10 月中旬中央改而確立「獨霸東北」方針。第二次是 1945 年 11、12 月之交，劉少奇要求彭眞配合蘇聯欲將大城市轉交國民政府的外交部署，將中共的發展重心從中心大城市轉向至周邊創建根據地（劉對此提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字句）；然而，彭眞仍繼續覬覦主要城市，並將力量布置在城市附近。劉少奇對彭眞的堅持己見，頗感心急，甚至語帶不悅地來電催促。由上可見，1945 年東北工作方針的調整問題上，劉、彭之間曾存有的不一致。

1945 年底，毛澤東提出東北應以發展根據地爲優先要務。但 1946 年上半年，由於國內和東北情勢的多變，毛和劉少奇爲首的中共中央，在較多的時候

---

[118] 馮蕙、汪裕堯、吳正裕、趙福亭，〈《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題解的主要修訂情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http://www.wxyjs.org.cn/wxzj_1/dbzb/201309/t20130906_144405.htm。（2015 年 5 月 20 日檢索）

對彭眞的指示，仍是偏向集中力量拼敵並奪佔要城。劉少奇就曾先後代中央發電指示東北局：「你們的一切決定於打敗蔣介石之進攻」；「必須打幾個勝仗」、「準備粉碎蔣軍的進攻」。[119]在這一階段，劉、彭之間在東北問題上，倒顯得較爲一致。

劉少奇在事後如何看待、處理彭眞主持東北局的問題，很值得觀察。因爲這對彭眞和林彪、高崗等人之後的關係，甚至是劉自身，皆造成了不利的政治影響。彭眞離開東北局、調回中央後，主要協助劉少奇工作。劉少奇對東北局爭論，抱持多說無益、團結向前的態度。一方面，希望不影響彭眞的工作情緒和幹勁；另一方面，期許彭眞的東北對手不要對此念念不忘、窮追不捨，而要以增進黨內團結爲己任。然而，高崗、林彪等人卻以爲劉少奇是非不分、偏聽偏信，偏袒彭眞；同時狐疑這是彭眞從中誤導、搞鬼的結果，並對之有恃無恐、「拉虎皮作大旗」的行徑，感到不屑。他們對劉少奇在 1950 年代初期建議繼續重用彭眞，更是不滿，進而認定劉、彭結黨謀私。這是高崗向劉少奇發起進攻的重要原因；或也是林彪跟高崗說劉少奇「又私又貪」的一項來由。[120]

高崗遭毛澤東離棄後，劉少奇在政治上雖化險爲夷，但毛仍要之帶頭在 1954 年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並督促其他高官自省。毛要彭眞就東北問題檢討，劉少奇當然要求彭眞按毛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定下的「路線性錯誤」調子，作自我反省。彭眞縱有不服，劉少奇也不予理睬，不但兩度親勸，更乾脆要彭眞在東北的「冤家」陳雲出馬施壓，終而迫使彭眞公開認錯。劉少奇此舉可收「一石三鳥」之效：一、完成毛要彭眞就東北問題檢討的任務，並爲毛在該事中的個人責任加以開脫；二、一報彭眞在 1945 年秋冬屢次不聽劉指揮的嫌隙和不快；三、劉嚴令彭眞檢討東北錯誤，事實上也是給自己一個自清的機會，證明自身對彭眞毫無徇私、絕無袒護。

目前沒有資料反映，從 1954 年以後至 1966 年彭眞倒臺以前的這段時間，

---

[1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冲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 547-548。

[120] 楊繼繩，《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評述集》，頁 101。

劉少奇曾就東北局爭論發表意見。直到毛澤東打倒彭眞以後，劉少奇代表中共向黨外細數彭眞的歷史錯誤時提到：「在解放戰爭中，在東北，他也犯過錯誤」。[121]劉少奇在不久之後也倒臺，並遭人質疑當年在東北問題上支持彭眞而非林彪，劉予以否認。[122]

八、「改革開放」時期彭真和陳雲的東北歷史爭論

1978 年 12 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會以後，彭眞才獲准回到北京。在如何安排彭眞的新職問題上，由於彭眞在「文革」前的位高權重和資深地位，黨內有一種主張讓之進入中共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輿論。但彭眞最終仍與中央常委一職失之交臂，而陳雲從中強力阻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陳雲在 1980 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1981 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和 1982 年中共「十二大」，皆堅決反對讓彭眞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論者指出：在毛後時代，陳雲之所以阻撓彭眞「入常」，乃肇因於 1940 年代中期兩人在東北局內的緊張關係。[123]另外，根據訪談資料，陳雲向中央列舉彭眞不適任中央常委的理由中，彭眞在東北的「錯誤」就在其列。[124]

在歷史恩怨和政治過節的交纏和交織下，「改革開放」時期的彭眞和陳雲之間互動冷淡。如何看待和評價東北歷史問題，更成爲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兩人政治「鬥法」的焦點。

（一）陳雲主持編寫《遼瀋決戰》

1983 年，遼瀋戰役紀念館著手編輯《遼瀋決戰》一書，敦請陳雲爲書名

121 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 年 6 月 27 日），收入宋永毅主編，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 4 部份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

122 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 356。

123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 147, 386. 黃靖指出：其相關訊息來自可靠的提供者，其中包括陳雲的政治秘書。

124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 年 7 月。

題字。陳雲看過書稿後，認爲內容並無新意，決定將之重新編輯。《遼瀋決戰》涉及中共在 1945 年以後如何成功經略東北的歷史。作爲當時東北局主要成員的陳雲，想藉由編輯此書以掌握相關歷史的詮釋權。陳雲爲此多次講話和召開座談會討論，更親自擇定編審小組人選，報請中共中央核准。在陳雲主導之下，《遼瀋決戰》的位階和重要性大大提高，一躍成爲具有黨中央認可性質的官書。

《遼瀋決戰》編審小組決定撰寫〈從進軍東北到全境解放——東北三年解放戰爭綜述〉，將之收錄在《遼瀋決戰》內，以作爲反映全書宗旨和立場的統一說明。陳雲對〈綜述〉甚表關切，審讀內容之外，對於〈綜述〉論及一些敏感的歷史問題如蘇聯角色和林彪評價，亦出面指導並加以定調。要如何看待、處理彭眞領導東北局九個月的歷史？由於彭眞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不僅僅是歷史問題，更是現實政治問題。《遼瀋決戰》編審小組不敢作主，唯陳雲主張是從。

陳雲表示：「東北解放戰爭初期，東北局內部在工作方針上確實存在過意見分歧」。具體分歧的情況是：「當時東北局的方針是通過獨佔大城市和鐵路幹線來獨佔東北，而多數同志不同意這個方針，認爲不應當用主力部隊去死守大城市、同暫時比我們強大的敵軍硬拼，而應把相當部份主力部隊和大部份幹部分散到廣大農村發動群眾，通過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逐步改變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125]陳雲話中所指的「當時的方針」的首要主張者，就是彭眞；陳雲則身屬於「不同意這個方針」的「多數同志」。

彭眞主導的東北局爲何主張「通過獨佔大城市和鐵路幹線來獨佔東北」？陳雲認爲責任不在黨中央，不應當說「毛澤東在指導方針上有什麼失誤」。[126]因爲「那時黨中央在千里之外的陝北，對東北的具體情況不可能了解得那麼清楚」。[127]陳雲更強調：「1945 年 12 月黨中央、毛主席明確提出我黨在東北的方針是『讓開大道、佔領兩廂』」；但東北局「在指導方針上的錯誤」「又持

125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 370。
1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下卷，頁 345。
127 朱佳木，《談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 214。

續了一段時間……給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失」。[128]陳雲意指彭眞沒有遵從黨中央、毛主席明確提出的「讓開大道、佔領兩廂」方針，反而繼續一意孤行。陳雲進一步地指出，東北局初期領導失誤的責任歸屬，乃在於彭眞身上：「主要是一些同志缺少經驗，尤其是缺少丟掉根據地的經驗」；「關鍵是在東北工作的同志，要善於把中央的指示與東北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29]

陳雲雖然堅持「東北局初期在指導方針上存在錯誤」，「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130]然而，彭眞相關「錯誤」的危害程度和嚴重性質，相較於「文革」以前，陳雲的立場有所變化，不再像之前那樣橫眉冷對、如見寇讎。這可以從陳雲重新看待 1948 年他和林彪、高崗一起制定的《關於東北解放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的有關部份觀之。陳雲認爲彭眞主持的東北局初期的「錯誤」，是「給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失」，但尚不及 1948 年《決議》中所稱的「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另外，1948 年《決議》認爲東北局（彭眞）初期之所以出現「錯誤」，乃因「對敵人的和平陰謀抱幻想」、是「喪失階級立場的危險傾向」。陳雲也認爲如此分析過於簡單、「不夠全面」。[131]

更重要的是，陳雲過去和林彪、高崗一致堅稱彭眞犯的是「路線錯誤」，也不再提起，而改說是「工作方針」、「指導方針」的錯誤。在中共的政治術語中，政治方針位階次於政治路線之下，方針錯誤的問題性質比路線錯誤輕得多。陳雲的這種變化，可能與當時中共領導人回顧、評價毛澤東時期黨內鬥爭，不再輕用路線鬥爭的提法有關，或也希望歷史當事人之間可以不拘泥在過往糾葛、團結一致向前看。

陳雲上述的歷史觀點和看法，最後都納入〈從進軍東北到全境解放——東北三年解放戰爭綜述（送審稿）〉。《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將〈綜述〉呈交給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處理。

---

[128]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 371。
[129] 朱佳木，《談陳雲》，頁 214。
[130]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 370。
[131]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 370-371。

（二）彭真的表態和反制

1985 年 11 月 22 日，楊尚昆將陳雲主導的《遼瀋決戰》的〈綜述〉轉送給彭眞。彭眞閱後甚不滿意，認爲其中關於他主政東北局的部份，「迴避了當時的許多重要史料」，「無視當時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命令，無視東北局、東北全黨全軍和東北人民執行這些指示、命令的實踐，是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132]彭眞決定撰文表達自己的立場和看法。

對於自身的寫作動機，彭眞表示：過去毛澤東曾兩次詢問他東北爭論的原委，但他一直抱持著委屈隱忍、不願說明的態度。在事發四十年後，彭眞要正式表態，以留諸青史：

> 關於東北解放戰爭頭九個月（我主持東北局工作）那段歷史的是非曲直，我四十年沒有講話。1948 年，毛主席從陝北到西柏坡後，他第一次見我，上來就問：「東北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沒有講，主要是考慮到當時戰略決戰在即，不願干擾主席，影響大局。再說，幾句話也講不清。建國後，有一次在北戴河，毛主席又問我：「當年東北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還是沒有講，也是不願干擾主席，影響大局。至於個人受點委屈，那是小事，「提起來千斤，放下去四兩」，不值一提。現在要講，就要實事求是，不作推斷，不去爭論，不批評任何人，不粉飾任何事，字字句句都要有根有據，經得起歷史的檢驗。[133]

彭眞最爲關心和亟欲澄清的核心問題是：他本人當年在東北局是忠實服膺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和指示，「沒有另搞一套」，更無存在「錯誤路線」。彭眞表示：

> 中央、中央軍委、毛主席根據形勢變化，適時調整部署、方針，是正常的。東北局領導內部在工作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時至今日，也還有不同意見嘛！有沒有兩條路線？拿事實作證明，沒有。

132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25。
133 《彭眞傳》編寫組，《彭眞傳》，卷 1，頁 447。

不論東北局、東總，還是我個人，都是嚴肅執行中央、中央軍委、毛主席的決定、指示、命令的，沒有另搞一套。當然，在那九個月的工作中也有失誤，需要總結，需要吸取，但不存在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立的所謂「錯誤路線」。毛主席也從來沒有講過東北那一段有什麼「兩條路線」。這一點有必要嚴肅地向後人作出交代。不然，以訛傳訛何時了？[134]

爲此，彭眞特別認眞對待陳雲主導的〈綜述〉裡的一個重要說法：中共中央當年明白飭令彭眞和東北局要執行「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方針，而後者沒有聽令和遵命。彭眞在自我回憶和細想後，不記得中共中央曾對他領導的東北局發送過此一明確的指示；在仔細查閱當年原始檔案後，也無發現文獻紀錄。最後，經查證，中共中央（劉少奇起草）提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字句，乃是在 1945 年 11 月 22 日發送給重慶的中共代表團的電報中，而且這一詞句也未曾發給過彭眞和東北局。[135]彭眞想藉此證明：他主持東北局期間，中共中央對東北工作所作的指示，沒有明確給予或簡單形成所謂「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針；也無法以之作爲概括或代表。在此情況下，陳雲主導的〈綜述〉指涉彭眞對此方針置之不理或執行不力，也就無從成立。至於「文革」前陳雲、林彪等人長期對彭眞所作的「路線錯誤」指控，自然更是不攻自破。

另外，彭眞也認爲：如果當年中共中央有「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指示，國軍不正可以長驅直入，中共又何以有機會在東北發展和建立根據地？[136]同情彭眞者（李運昌）也認爲：彭眞主政東北爲時雖不長，但經由在南滿地區堅持鬥爭，拖住了國軍的主力，從而保住了北滿地區，爲中共在東北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137]

---

134 《彭眞傳》編寫組，《彭眞傳》，卷 1，頁 447。

135 《彭眞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26。

136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眞：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眞理——黨史專家田西如訪談錄〉，《黨史文匯》，2012 年第 11 期，頁 20。

137 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眞》，頁 210。

歷經近一年的努力，彭眞完成《對〈從進軍東北到全境解放——東北三年解放戰爭綜述（送審稿）〉幾個主要問題的說明》。在此一內容近兩萬字的《說明》中，彭眞著力敘述當年中共中央對東北問題的指示情況和變化，以及他據此執行的過程和情形。[138]1986 年 10 月 23 日，彭眞將其精心撰寫的《說明》送楊尚昆轉報中央常委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139]站在陳雲立場、負責草擬〈綜述〉的《遼瀋決戰》編審小組，看到彭眞這篇旨在批駁〈綜述〉的《說明》後，要求中共中央對此再予覆議。[140]爲了黨內的和諧與團結，也避免糾結在過去的歷史，11 月 1 日，鄧小平批示：「我同陳雲、先念同志商定，這種問題不要再扯了」；[141]「兩個文件都存檔，但都不發表」。[142]

彭眞應是樂見鄧小平的批示。因爲經過鄧小平的表態後，他所作的《對〈從進軍東北到全境解放——東北三年解放戰爭綜述（送審稿）〉幾個主要問題的說明》，已成功地阻擋陳雲策劃的〈從進軍東北到全境解放——東北三年解放戰爭綜述（送審稿）〉的發表計劃。而且鄧小平指示的「兩個文件都存檔」，代表彭眞對東北問題的意見，獲得黨中央同樣的重視，成爲中央所藏的正式檔案。然而，此事並沒有到此爲止，不久即因陳雲一方的另有動作而硝煙再起。

陳雲和其助手確認他們組織撰寫的〈綜述〉無法放入《遼瀋決戰》後，改而組織一篇由韓先楚具名的「集體創作」文章—〈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收錄在《遼瀋決戰》中並作爲該書的「概述」。此文沒有像〈綜述〉一樣事先報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審查，彭眞也無從得知和過問。1988 年 10 月，陳雲指導下的《遼瀋決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韓先楚署名的〈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隨著《遼瀋決戰》面世後，立即引起彭眞的關注和不悅。因爲韓文中指出：中

138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眞：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眞理——黨史專家田酉如訪談錄〉，《黨史文匯》，2012 年第 11 期，頁 19。
139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5，頁 378。
140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 373。
1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下卷，頁 1149。
142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頁 373。

共中央當年曾多次明確給予東北局「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指示，但後者「中間曾多次發生過搖擺和變動」。另外，韓文認爲中共中央主張、彭眞堅決執行的「四平保衛戰」，雖斃傷和阻滯敵人，但「在戰略上是失策的」。[143]

彭眞對韓先楚一文難以坐視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彭眞先前費心撰寫《說明》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駁斥陳雲主導的〈綜述〉的相關論點——中共中央明白指示東北局要「讓開大路、佔領兩廂」，而彭眞沒有遵旨行事。鄧小平在聞知陳雲和彭眞的爭論後，指示兩邊不要再爲此爭扯，各自文章按下不發。但陳雲卻沒有偃旗息鼓，利用韓先楚一文公開他自己對東北歷史的觀點和說法。既然陳雲使計在先，沒有遵循鄧小平「存檔」、「不發表」的批示辦理，彭眞也不願忍氣吞聲，決定全面反制和反擊。

一、彭眞向中共中央反映意見，要之查處。針對韓先楚署名文章的問題，彭眞將他先前所寫的《說明》「重新提煉、修改」成〈東北解放戰爭的頭九個月〉一文，[144]在 1988 年 11 月交送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請之查證，同時也呈送一份給鄧小平。中共中央主管黨史機關查閱檔案後，確認、同意彭眞的歷史主張。《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因而被要求：以其名義正式發表〈重要更正〉，夾附在《遼瀋決戰》中，隨書發行。這紙〈重要更正〉的內容有兩點：一、針對韓先楚文章所提的中央「多次指示」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指出：「據查，中共中央當時並未對東北局作過這樣的指示，這種提法不是事實」。二、針對四平戰役評價，指出：「四平保衛戰，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所肯定的，韓文的提法與當時中央和東北局的提法不同，是錯誤的」。最後，〈重要更正〉要求讀者自行刪去韓文的相關兩段文字。[145]

另外，受此影響，中共中央在修改重訂《毛澤東選集》第 4 卷時，也將毛澤東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原題解中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字詞

143 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收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合編，《遼瀋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上冊，頁 81、84、88。

144 《彭眞傳》編寫組，《彭眞傳》，卷 1，頁 446。

145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頁 227-228。

刪去，以免其繼續傳播和造成影響。新版的《毛澤東選集》在 1991 年出版。

二、彭眞公開發表他對東北歷史的看法。彭眞寫成〈東北解放戰爭的頭九個月〉，自不甘藏諸名山，而是爭取讓各界知曉他對相關歷史的「聲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合辦的刊物《黨的文獻》，在 1989 年 1 月刊登此文，使之具有獲得中央認證的意義。由彭眞親自審訂的《彭眞文選（1941-1990 年）》，經過中共中央批准，也將此文收錄，在 1991 年隨書發表。

三、彭眞推動出版《遼瀋決戰》的續集。彭眞對於 1988 年 10 月出版的《遼瀋決戰》，多僅呈現陳雲的「一面之詞」、沒有太多自己的聲音（書中僅收錄兩篇由彭眞主持起草的東北局指示，還有彭眞的題詞），自是不滿。補救的重要方法就是主張編輯《遼瀋決戰》的續集。在《遼瀋決戰》續集成書的過程中，彭眞召見編審小組負責人伍修權談論東北歷史問題，以確保自己的看法和解釋可以納入書中。[146]最後，1992 年出版的《遼瀋決戰・續集》，也確實將彭眞所寫的〈東北解放戰爭的頭九個月〉一文置於最醒目的首篇位置。

因編寫《遼瀋決戰》引發的東北歷史問題爭論，最後演變成彭眞的反守爲攻，甚而火線全開。東北問題多年來一直是彭眞的政治負擔，他在東北的對手在「文革」前和「文革」後皆以此爲一項重要事由，阻攔他的仕途發展。彭眞年過 80 後，更多地希望在這一歷史問題上留下不壞的名聲和評價。就算有其他黨國元老（聶榮臻）勸說彭眞對歷史問題宜「任人評說」，[147]他也仍執意闡明自己的看法。〈東北解放戰爭的頭九個月〉即是彭眞對東北問題最有計劃、系統的正式表述。彭眞在文中強調：他當年在東北的言行，乃是在貫徹中共中央的意志。在毛澤東主政時期，彭眞不好明說此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代人受過的成分；在毛後時期，彭眞不再有這方面的顧慮，可以娓娓道出他東北政策和舉措背後的中央根源。與此同時，也可反襯出他人（特別是陳雲）一再控其有違中央方針，乃是言過其實和別有居心。然而，關於彭眞自己所言的「在

---

146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5，頁 467。
147 聶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頁 453-454。

那九個月的工作中也有失誤」的問題，在此文中則鮮有提及和交代。

（三）彭真對編寫「四野」戰史的積極參與

1994 年 1 月 30 日，年高 89 歲的陳雲交代原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洪學智出面領導編寫中共第四野戰軍的戰史，並囑咐要修建由「四野」執行完成的平津戰役的紀念館。對於編寫「四野」戰史，陳雲毛遂自薦擔任顧問。[148]值得注意的是，陳雲要洪學智徵求彭眞的意見。[149]陳雲或想藉此向彭眞表示友善之意，不欲重演前一回各據一詞、訴諸公眾的筆墨官司。

洪學智按陳雲的指示，將其意見報送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張震。同年 6 月軍委主席江澤民正式批准成立「四野」戰史顧問和編寫領導小組，確認陳雲和彭眞同時並列總顧問之職，洪學智擔任領導小組組長，並另有多位副組長。在江澤民批准之前一日，洪學智登門造訪彭眞，轉達中央軍委望之擔任總顧問的邀請。[150]彭眞欣然同意就任，或也不想要再發生之前由陳雲一人主導編輯《遼瀋決戰》、他只能被動地事後採取補救措施的局面。

洪學智很注意徵詢陳雲、彭眞對編寫「四野」戰史的意見。對於如何處理「四野」統帥林彪的問題，陳、彭之間沒有不同的意見，咸認爲對之要予以正視。至於如何書寫、評價 1945 年日本戰敗後中共初期經略東北的這段歷史，陳雲因爲在次年的 4 月 10 日去世，而無法堅持並確認「四野」戰史會如其所意撰寫。相對之下，仍健在的彭眞就繼續享有爲己發聲的機會和優勢。

洪學智在當年彭眞主持東北工作期間，因管理鐵路交通有成績，曾獲得彭眞的誇獎。[151]洪學智在半世紀後主持編寫「四野」戰史，他對彭眞主政東北期間的相關歷史所作的論述和結論，也比較貼近彭眞的意見和看法。1980 年代中後期編寫《遼瀋決戰》出現意見分歧的若干歷史問題，尤其是：中共中央有

---

1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卷，頁 449。
149 洪學智，〈難忘的教誨，深切的思念〉，《緬懷陳雲》編輯組編，《緬懷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37。
150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5，頁 491。
151 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頁 207。

無對東北局提出過「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指示；關於四平戰役的評述問題等。在「四野」戰史編寫和討論的過程中，又再次浮現。為此，洪學智召開座談會，研究處理意見。1996 年夏，在洪學智領導下完成「四野」戰史徵求意見稿，發送給 135 位「老同志」和 12 個單位審讀。作為總顧問的彭眞自是徵求意見的重要對象。由於此時陳雲已死，彭眞更能暢所欲言、不受羈絆。高齡近 94 歲的彭眞不顧年邁，親自審讀「四野」戰史徵求意見稿的前 3 章（主要關乎他主政東北的那段歷史），並且組織人員對該稿「作了認眞研究和修改，提出了書面修改意見」。[152]

根據「四野」戰史編寫領導小組副組長糜振玉（負責常務工作）的說法：時間集中在 1996 年 10 月至 11 月的反饋意見中（包括彭眞在內），都基本肯定此一徵求意見稿。在其共同的看法中，覺得彭眞主政東北的九個月和遼瀋戰役中林彪的功過問題，「處理得不錯」。[153]由此應該可以看出：彭眞基本滿意此稿中涉及他個人歷史的部份。然而，在約三個月之後的 1997 年 2 月，彭眞就陷入昏迷，並於 4 月 26 日宣告不治，因此彭眞沒來得及看到「四野」戰史的最終定稿和付梓。

洪學智及其助手注意汲取、吸收包括彭眞在內所提出的反饋意見，進而完成了「四野」戰史的送審稿。1997 年 3 月 25 至 28 日，洪學智主持編寫領導小組會議對之進行討論。絕大多數的小組成員對送審稿內容表示肯定；但是個別成員堅持中央當時對東北有發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指示，對四平戰役持以「戰略上是錯誤的，戰術上是成功的」的負面評價，以及認為 1946 年的「七七決議」有批評彭眞犯下「路線錯誤」。這些意見實際上多半是 10 年前陳雲指導的《遼瀋決戰》的主張和觀點，其中部份提法（如認為彭眞犯有「路線錯誤」）甚至是連陳雲都不再使用的。以洪學智為首的多數與會人士，沒有

152 糜振玉，〈憶洪學智首長領導我們編寫《第四野戰軍戰史》〉，收入蔣勝祥主編（下略），《洪學智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金盾出版社，2013），頁 322-323。

153 糜振玉，〈憶洪學智首長領導我們編寫《第四野戰軍戰史》〉，收入《洪學智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323。

接受這些異議主張，最後同意送審稿對相關爭議問題的敘述，並原則通過該稿。[154]會後，持不同意見者如領導小組副組長蘇靜，在 6 月憤而致信江澤民，抗議「完全按照彭眞同志的觀點改寫這一段歷史」，並請求辭去副組長職務。洪學智也在 7 月向中央軍委呈報他的立場和說明。

以江澤民爲「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東北問題爭論的兩位主要當事人陳雲、彭眞皆已離世以後，決心藉由對「四野」戰史送審稿表態的機會，了結這樁糾纏多年、影響團結的黨內爭論。其具體作法是：透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正式書面回應的方式，表達對洪學智領導編寫的「四野」戰史送審稿相關論述（針對「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四平決戰、「七七決議」問題）的肯定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答覆意見中表示：「在整個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包括在東北地區內，黨內軍內並沒有發生過什麼路線性質的嚴重分歧和爭論」。[155]彭眞若地下有知，應會含笑樂見以上代表黨中央立場的歷史論斷。

1998 年 10 月，由彭眞名實相符擔任總顧問（較早去世的陳雲反倒只有總顧問的虛銜）、洪學智領頭編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正式出版。

九、結　論

以彭眞爲核心的中共東北局爭論，發生在 1940 年代中期，相關爭論在半世紀後仍未見停歇。主要當事人從當年的壯年才俊，歷經嚴酷的政治鬥爭倖存下來，也已變成黨國大老。

---

[154] 糜振玉，〈憶洪學智首長領導我們編寫《第四野戰軍戰史》〉，收入《洪學智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324-325。

[155] 糜振玉，〈憶洪學智首長領導我們編寫《第四野戰軍戰史》〉，收入《洪學智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325-326。

東北局爭論主要圍繞在：東北的工作指導方針是否需要及時轉變、對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指示有否確實執行，以及有無其他更爲迫切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彭眞強調他對中央的指令劍及履及、不打折扣；林彪、陳雲、高崗等人則認爲彭眞違背中央、自行其是，因而貽誤軍機並對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由於兩方僵持不下、不見容於對方，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決定重組東北局，將彭眞由正轉副，改由林彪主持工作。如何看待彭眞領導東北的問題？彭眞在東北的對手不留情面地控訴彭眞犯下的是無法寬恕的「路線錯誤」。毛澤東覺得彭眞有錯但尚不至此嚴重；但毛也沒有承擔起中央當時指使彭眞行動而應負起的重要責任。彭眞認爲他工作有過失，但自認奉中央指令爲圭臬，絕無形成「兩條路線」；他對毛所定調的「路線性錯誤」，並非沒有意見，但也只能接受。

1945 年秋到 1946 年中的東北爭論，成爲彭眞和陳雲、林彪、高崗之間無法擺脫的深暗陰影，也是難以跨越的政治深坎。彭眞和相關人士赴東北共事之前，在陝北時可能有些不愉快：彭眞在延安受毛澤東寵信，快速竄升、權傾一時，取代陳雲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彭眞協助毛在中央黨校開展整風運動，殃及者眾，其中就包括林彪之妻；[156]另外，黨校運動的激進也引起高崗的側目。[157]但在經過東北爭論後，彭眞與他們之間才出現根本不能修補的嚴重裂痕。因爲雙方在爭吵過程中不但怒目相向，更都試圖拔除對方官職，致使彼此政治互信喪失、同志情誼俱無。

從彭眞離開東北到「文革」爆發，彭眞的政治任命和升遷，經常因高崗、陳雲、林彪作梗而受到影響。東北舊怨在其中起到了相當的作用。彭眞在 1948 年中央華北局的職務任命、1950 年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候補問題，都可見他們的反對之聲。因林彪指責彭眞在東北犯錯，1953 年彭眞交出兼任的中組部部長職位；[158]同年高崗也對由彭眞出任政府黨組書記的擬議，深表不可。1954

156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 337-338。
157 溫相，《高層恩怨與習仲勳——從西北到北京》，頁 377。
158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眞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2012 年第 10 期，頁 73。

年高崗死後，彭眞按毛澤東之意，在中央全會上公開檢討其東北錯誤。按照黨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彭眞應可自東北問題上解脫。但因爲當年關外的仇隙實在太深，彭眞和林彪、陳雲之間仍然一直沒有私人往來，後者也從未登門造訪。尤有甚者，林彪、陳雲繼續基於往昔的東北情仇，反對彭眞進入 1956 年新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林彪之後反對中央給予彭眞副總書記之銜，主要根由也在於此。彭眞在屢受壓抑後，1962 年也曾暗中動作和蒐證，意欲向陳雲、林彪報復，最後不了了之。

陳雲因經濟主張遭毛澤東批判而被迫淡出政治後，彭眞還得面對後勢看漲的林彪。兩人東北舊仇冤冤相報後，更是積重難解（彭眞心知肚明，自評與林關係不好、問題未了）。東北舊恨又易成爲新仇滋生的溫床，兩者交加重疊，治絲益棼。毛澤東在 1960 年代中期或曾考慮同時重用林彪和彭眞，彭眞見勢也向林彪致意，但林彪未見得願意配合和買帳。1966 年毛下令打倒彭眞，爲「文革」祭旗。林彪隨即大批彭眞的東北錯誤，爲後者再添加一條政治罪名。由於彭眞已政治崩盤，林彪此舉並非爲了攻擊彭眞找藉口，他要的是將自己和彭眞之間的東北過節，做一徹底的政治清算和了結。

「文革」後，彭眞在政治上仍受制於陳雲。然而，在評說東北歷史問題上，彭眞不願盡由陳雲壟斷，毅然與之爭鋒、論戰，至死方休。

最後，從前述正文的介紹和討論中，如何增進對作爲一個政治人物的彭眞的認識？簡要地舉例來說：一、在「二戰」後緊急、紛亂的東北情勢中，彭眞未能統領全局，展露服人的領導視野和能力。從後來實踐的結果來看，彭眞的長才不在於非常時期的開拓戰局，而是在承平環境下的政治治理。二、彭眞「黨性」堅強，對中央上級的號令講重落實，不顧犧牲和代價，難免有不知變通、有欠靈活、不體恤下情的非議。三、彭眞政治個性強硬，自認擇善執著，得罪人而不在意，如此容易令之在黨內有失人和與人緣。彭眞在東北開罪的主要對象，多是所謂的政治實力派，彭眞在往後的政治中也因此吃虧不少。四、彭眞因東北問題屢次遭人告發、政治受挫，其不免也有挾怨報仇的凡人性情；彭眞

晚年對相關官方歷史撰寫的參與和監製，不遺餘力、死而後已，他在其中有否矯枉過正、甚至文過飾非，恐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159]

---

159 參與東北戰爭的閻仲川（曾官拜共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因林彪問題而遭冷凍），在 1999 年 9 月上書江澤民。閻仲川批評：彭眞當年在東北先是對中央「獨佔東北」的指示，一派樂觀、不作具體分析；繼而對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指示等閒視之，對大城市流連不去，從而喪失時間、損失幹部；最後對中央提出的搶佔、據守大城市的決定，全力執行、不留餘地。易言之，彭眞對中央指令不知權衡制宜、不分輕重緩急。閻氏也不滿彭眞晚年以勢逼人，要求按其主張撰寫「四野」戰史的相關部份。〈閻仲川對四野戰史的幾點意見（1-14）〉，舒雲探訪九一三事件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47da480100p5ia.html。（2015 年 6 月 8 日檢索）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各高等學校十五級以上黨員幹部討論高饒事件傳達報告的情況〉（1954 年 4 月 11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 001-022-00088，「高校黨委關於北京市各高校學習七屆四中全會文獻的總結、情況報告」。

〈彭真市長會見剛果駐華大使迪亞卡·貝納頓談話記錄——剛果大使到任拜會並就剛果的反帝鬥爭問題交換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號 108-01227-04，「北京市長彭真會見剛果共和國新任駐華大使貝納頓談話記錄」。

〈蔣南翔同志在清華大學四中全會學習幹部會上的發言〉（1954 年 6 月 10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 001-022-00089，「蔣南翔、范儒生、楊述同志關於四中全會決議學習的報告提綱和紀錄」。

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宣傳部，〈向農村黨、團員傳達四中全會提綱〉，北京市檔案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 001-012-00160，「市委宣傳部關於北京市幹部、群眾學習總路線和黨的四中全會的通知、報告及有關材料」。

宋　碩，〈高等學校討論高饒事件傳達報告的情況〉（1954 年 4 月 10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中共建國後檔案》，檔號 001-022-00088，「高校黨委關於北京市各高校學習七屆四中全會文獻的總結、情況報告」。

二、史料

〈譚老闆答記者問〉，首都紅代會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公社》主辦，《新農大》，期 21，1967 年 6 月 10 日，第 2 版。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5、1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2。

公安部批判劉、鄧聯絡站，《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在公安戰線上的反革命罪行》，北京，1967。

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陳樂人、謝蔭明主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5 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

宋永毅主編，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牒）》，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1967。

三、年譜、文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冊 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彭　眞，《彭眞文選（1941-199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彭眞傳》編寫組編，《彭眞年譜（1902-1997）》，卷 1、4、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四、回憶資料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眞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2012 年第 10 期，頁 68-73。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何　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

呂正操，《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

李　莉，〈憶李琪最後的日子和我的遭遇〉、〈憶彭眞同志〉，《憶李琪》，北京，2001，頁 284-318、319-329。

李建彤，《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

李海文、王燕玲，《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眞》，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冊，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1。

洪學智，〈難忘的教誨，深切的思念〉，收入《緬懷陳雲》編輯組編，《緬懷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34-38。

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曾　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楊繼繩，《楊繼繩：中國當代名人政要訪談評述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劉　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

劉振德，《我爲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鄧力群，〈關於西樓會議的回憶〉，《百年潮》，2012 年第 3 期，頁 11-17。

糜振玉，〈憶洪學智首長領導我們編寫《第四野戰軍戰史》〉，收入蔣勝祥主編，《洪學智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金盾出版社，2013，頁 313-327。

鍾子雲，〈回憶東北「八一五」光復初期的幾個重要情況〉，收入李海文主編，《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1921-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頁 309-336。

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收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合編，《遼瀋決戰》，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 81-141。

聶　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五、專著

丁凱文、司馬清揚，《找尋眞實的林彪》，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冲及主編，《劉少奇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冊 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冲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田玄著，周宏雁、姜鐵軍主編，《解放戰爭全記錄‧卷一：和戰之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朱佳木，《談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李思愼、劉之昆，《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馬　雅，《大風起兮：馬洪傳——中共高層政爭內幕》，紐約：明鏡出版社，2014。

《彭眞傳》編寫組，《彭眞傳》，卷 1、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彭眞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眞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彭眞傳》編寫組編、田酉如著，《彭眞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彭德懷傳記組，《彭德懷全傳》，冊 3，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溫　相，《高層恩怨與習仲勳——從西北到北京》，紐約：明鏡出版社，2008。

趙家粱、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穆　欣，《林楓傳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

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otter, Pitman B.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anner, Harold M. *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 Siping, 194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六、論文

孟　醒，〈彭眞、林彪在東北局〉，《文史精華》，總期 273，2013 年 2 月，頁 9-14。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眞：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眞理——黨史專家田酉如訪談錄〉，《黨史文匯》，2012 年第 11 期，頁 15-22。

金冲及，〈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28。

姚依林，〈關於我和彭眞的關係〉（1967 年 1 月 31 日），美國一位中共歷史研究者提供。

畢健忠，〈對四平保衛戰的沉思〉，《軍事歷史》，1996 年第 3 期，頁 23-28。

舒　雲，〈林彪與東北解放戰爭（上）〉，《黨史博覽》，2009 年第 4 期，頁 19-24。

楊奎松，〈一九四六年國共四平之戰及其幕後〉，《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132-152。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眞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期 51，2013 年 4 月，頁 136-159。

Chung, Yen-Lin.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 74 (July 2015), pp. 129-143.

七、網路資料

〈閻仲川對四野戰史的幾點意見（1-14）〉，舒雲探訪九一三事件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47da480100p5ia.html。（2015 年 6 月 8 日檢索）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眞和毛澤東 1963 年後的關係〉，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2011 年 5 月 1 日檢索）

馮蕙、汪裕堯、吳正裕、趙福亭，〈《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題解的主要修訂情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http://www.wxyjs.org.cn/wxzj_1/dbzb/201309/t20130906_144405.htm。（2015 年 5 月 20 日檢索）

Peng Zhen's Role in the Disputes of the Northeast Bureau of the CCP and His Subsequent Relationships with Gao Gang, Lin Biao, and Chen Yun, 1945-1997

Chung Yen-lin*

Abstract

After Japan's surrend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as eager to occupy northeast China due to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soon established the Northeast Bureau (NEB) under Peng Zhen in mid-September 1945. However, fierce disagreements arose between Peng and his colleagues in the NEB such as Gao Gang and Chen Yun, as well as the military leader Lin Biao, over strategy. The Party Center ultimately decided to reorganize the NEB, and Lin replaced Peng in June 1946. The disputes of the NEB severely damaged Peng's relationships with his rivals in Manchuria in mid-1940s an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Peng's career was frequently undermined by Gao, Chen, and Lin in the pre-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while Peng also tried to take revenge whenever he had the chance to do so.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n harshly criticized Pe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en Yun continued to block Peng from obtaining a seat in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But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Peng devoted himself to debating NEB history with Chen, and he finally succeeded in influencing the official writing of NEB history. This article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icated leadership politics of the CCP.

Keywords: Peng Zhen, Northeast Bureau, Chen Yun, Lin Biao, Gao Gang

*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